

反帝愛國與宗教革新——

試論中共建國初期的基督教革新宣言

摘要

共產主義與基督教的關係，向來是個備受爭議的課題。一九四九年中共建國，揭開了中國基督教歷史新的一頁。政治、社會、經濟處境甚至外交關係的變化，無可避免地影響及制約了中國基督教的生存環境。在嶄新的形勢下，近代西方來華傳教運動及藉此建立的中國基督教事業，面對著前所未有的變局與挑戰。眾所週知，基督教三自革新運動的開展與深化，很大程度上主導，甚至改寫了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國基督教的發展格局。而〈中國基督教在新中國建設中努力的途徑〉宣言的出現，更肇始了基督教革新運動的序幕。本文旨在探討中共建國後，革新宣言的由來與影響。本文從黨國、基督教進步人士及新教建制（協進會派）三者的互動關係，來重構革新宣言出現的歷史背景。其中黨國的角色，更在在主導了歷史的發展。

“Christian Manifesto” and the Making of a Patriotic Protestant Church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bstract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Chinese Communism and Protestant Christianity is an interesting and debating issue.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1949, the tremendous changes in political, social, economic and diplomatic setting inevitably determined the survival environment of the Chinese Church. The western missionary movement and the Christian enterprise that inherited from it were facing an unprecedented challenge. The Christian Three-Self Reform Movement that launched after 1950 significantly reshaped the development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into a patriotic and anti-imperialistic outlook. This paper aimed at studying the origin and the effects of the famous “Christian Manifesto” (Direction of Endeavor for Chinese Christianit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China) of 1950, to see how the reform of Chinese Protestantism was being constrained by the interaction of the Party-State, Christian Progressive, and the Protestant establishment.

關鍵詞：革新宣言 三自運動 共產主義與基督教 宗教革新 吳耀宗

Key Words : Christian Manifesto Three-Self Movement Communism and Christianity
Religious Reform Wu Yaozong (Y. T. Wu)

邢福增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

電話：852-26096747

傳真：852-26035280

電郵：yingft@cuhk.edu.hk

YING, Fuk-tsang

Divinity School of Chung Chi Colleg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反帝愛國與宗教革新——

試論中共建國初期的基督教革新宣言*

一．前言

一九四九年新中國成立，揭開了中國基督教歷史新的一頁。政治、社會、經濟處境甚至外交關係的變化，無可避免地影響及制約了中國基督教的生存環境。在嶄新的形勢下，近代西方來華傳教運動及藉此建立的中國基督教事業，面對著前所未有的變局與挑戰。

眾所週知，基督教三自革新運動的開展與深化，很大程度上主導，甚至改寫了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國基督教的發展格局。¹而革新宣言的出現，更肇始了基督教革新運動的序幕。革新宣言全名為〈中國基督教在新中國建設中努力的途徑〉，這個宣言有多個不同的簡稱，包括基督教宣言、三自宣言、革新宣言等，本文統稱「革新宣言」。毋庸置疑，吳耀宗及革新宣言在當代中國基督教的發展過程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正如宣言發起時致全國同道的公開信所言：「這篇宣言是中國基督教一個有歷史意義的文件，它對於中國基督教的前途和它的發展，也有異常重要的關係」。²

本文旨在探討新中國成立後，革新宣言的由來與影響。筆者認為，我們必須從黨國、基督教進步人士及協進會派人士三者的互動關係，來重構革新宣言出現的歷史背景，其中黨國的角色，更在在主導了歷史的發展。

二．革新宣言的由來

中共對天主教及基督教問題的基本政策

在黨國眼中，中國的宗教包括民族宗教及與政治有聯繫的宗教，前者包括伊斯蘭教及喇嘛教，後者則是基督教及天主教等跟帝國主義有聯繫的宗教。³

五〇年三月，第一屆全國統戰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其中明確了黨國對天主教及基督教的政策。首先，是把宗教工作置於既團結又鬥爭的統戰政策之中。周恩來在是次會議上，指出中央的根本方針是「宗教要同帝國主義割斷關係」，「中國的宗教應該由中國

* 本文為「革新抑改造——新中國的基督教控訴運動」(Reform or Remold: Denunciation Campaign of Protestant Christianity in New China)研究計劃的一部分，獲香港中文大學 Direct Grant for Research 2004-2005 資助。

¹ 關於五十年代三自運動的研究，可參 Philip L. Wickeri, *Seeking the Common Ground: Protestant Christianity, the Three-Self-Movement & China's United Front* (N. Y.: Orbis, 1988), Ch. 5. Richard C. Bush, *Religion in Communist China* (Nashville: Abingdon Press, 1970), Ch. VI. 另趙天恩,《當代中國基督教發展史(1949-1997)》(臺北:中國福音會,1997),第1章;邢福增:〈三自愛國運動的起源與發展(1949-1957)〉,邢福增、梁家麟,《五十年代三自運動的研究》(香港:建道神學院,1996),頁7至84。

² 〈文件發起人致全國同道書〉,《天風》,第233至234期(1950年9月30日),頁3。

³ 參一九五〇年六月廿五日周恩來在全國政協二代黨經會上的發言,中共中央文獻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1950年6月25日,上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頁49至50。

人來辦」。在反對帝國主義的同時，卻要避免「牽連宗教信仰問題」。⁴

其次，爲了要肅清帝國主義在宗教界的勢力與影響，有必要推動宗教革新的工作。這種革新，必須是在中央的主導下，由宗教界內部開展的。正如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李維漢在報告中提出「要到裡面去進行工作，逐步地改變其政治面貌」。他按政治背景把教會人士分成三大類：(一)進步分子及愛國民主人士；(二)中間分子和落後群眾；(三)帝國主義分子，並提出要依賴前者，爭取團結中者，孤立後者的政策，以實現「自治」「自給」「自傳」的目標。⁵

五〇年六月六至九日，中共召開七屆三中全會，周恩來在會上作出〈關於外交和統一戰線工作的報告〉，提及要幫助宗教界人士「割斷同帝國主義的關係」，贊助他們「自己辦宗教，自演自唱，不要外國人來傳教」。⁶中共中央於八月發出〈關於天主教、基督教問題的指示〉，可說是建國初期中共對基督教及天主教工作的基本政策。指示首先認爲中國的天主教及基督教一方面是宗教問題，另一方面「在長期中又被帝國主義用爲對我國進行文化侵略的工具」。因此，新中國在明確保護信教自由的同時，亦堅持反對其中的帝國主義的影響，並把作爲帝國主義侵略工具的教會，變爲中國人自己辦的宗教事業。在上述基本方針之下，必須在基督教及天主教內部，利用各種機會，「經過有愛國心的教徒」，向教徒群眾進行愛國主義的宣傳，特別是要「揭露帝國主義文化侵略與間諜活動的陰謀」。黨國亦要「領導和支持」這些愛國分子，去「團結」大多數虔信教徒，「反對」仍與帝國主義勾結的少數反動分子。⁷

新華社後來把這個指示的主要內容發給各報章，充分突顯出政府反對帝國主義利用天主教及基督教的立場。⁸而往後的歷史亦在反映出，黨國的宗教政策基本上亦循著有關的方向發展。

我們清楚可見，黨國高度重視天主教及基督教與帝國主義的關係。中共期望藉著教會內的進步分子及愛國民主人士，開展「民族民主醒覺運動」，實現割斷其與帝國主義聯繫的總目標。毋庸置疑，吳耀宗已成爲黨國重視的基督教愛國及進步分子。⁹在一九四九年一月，中共中央接觸吳，邀請他北上商討基督教的一般問題。三月十九日，吳抵達北平。¹⁰三月廿一日，中央統戰部在六國飯店舉行的茶會，招待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及無黨派民主人士，李維漢部長向各人闡述新民主主義的性質，並在這個原則下由新政協通過〈共同綱領〉。筆者相信，吳耀宗出席了這次茶會。廿二日，李維漢與吳耀宗面談，向他解釋中國共產黨關於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吳表示完全同意。¹¹三月廿九日，

⁴ 周恩來，〈發揮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積極作用的幾個問題〉，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頁186。

⁵ 李維漢，〈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新形勢與新任務（1950年3月21日）〉，《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冊，頁152。

⁶ 中共中央文獻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1950年6月6-9日，上卷，頁46。

⁷ 〈中共中央關於天主教、基督教問題的指示（1950年8月19日）〉，《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冊，頁408至412。

⁸ 〈對於天主教基督教問題應有的認識〉，《天風》，第242期（1950年12月2日），頁8至9。《天風》全文也轉自11月24日的上海《解放日報》。同文亦刊於《人民日報》，1950年11月20日。

⁹ 梁家麟，〈中共建國前後吳耀宗的教會改造思想〉，氏著，《吳耀宗三論》（香港：建道神學院，1996），頁24至27。

¹⁰ 吳耀宗，〈人民民主專政下的基督教〉，《天風》，第176期（1949年8月20日），頁3。

¹¹ 李勇、張仲田編著，《統一戰線大事記——解放戰爭時期統一戰線卷》（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1988），頁553。

吳赴布拉格出席世界和平大會，他請沈體蘭¹²作代表，與中共當局接洽。五月廿五日，吳回到北平後，便與沈繼續與中共中央及地方當局商討基督教的具體問題。¹³在中共眼中，吳耀宗這位宗教界的愛國人士，成為可資信任的教會改革倡導者。〈人民民主專政下的基督教〉一文，充分反映出吳與中共接觸後，要求中國教會「悔改」，迎合新時代的訴求。¹⁴九月召開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上，吳氏是基督教五位代表代之首。後來又先後被委任為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政治法律委員會委員及華東軍政委員會委員。¹⁵隨著客觀政治形勢的發展，黨國於一九五〇年間通過不同的途徑，逐步支持吳耀宗，讓他來領導符合黨國政策的基督教革新運動。一九五〇年七月發表的革新宣言，可說是黨國與基督教愛國分子合作的產物。

基督教訪問團與全國基督教會議

革新宣言的蘊釀，肇始於基督教人士訪問北京時與周恩來面談的結果。而基督教訪問團的產生，又與全國基督教會議的籌備有關。可以說，兩者都是基督教人士在新中國成立後思索前路及變革的回應，同時又反映出基督教內兩派不同人士從合到分的曲折歷程，而革新宣言又在其中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讓我們先從基督教訪問團談起。

從現有資料所見，訪問團的籌組，與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有密切關係。一九四九年十月廿五至廿六日，協進會在上海召開新中國成立後的第一次執行委員會。吳耀宗在會上報告中央人民政府將在內務部下設立「宗教事務委員會」，而人民政協全國委員會亦將設「宗教事務組」。在這種情況下，協進會執委會認為在基督教方面應成立「一全國強而有力之行政總機構，以謀與人民政府宗教機構取得聯繫」。是次執委會決議由全國協進會在最短時期內召開全國性的基督教代表會議，商討成立全國性的基督教機關，期望能廣大地包括全國一切大小宗派，成為一個全國性的行政總機構。¹⁶

在協進會執委會召開前，關於召開全國性基督教會議的消息已在教會界內流傳。《天風》更發表了社論文章，呼籲「中國人民教會」迅速召開中國基督教協商會議。¹⁷為了促進全國會議，執委決議組織訪問團，到華北、華中、西北、中原、華東及華南訪問。¹⁸吳耀宗亦是協進會的執委，他亦欲藉著訪問團，可以把一九四九年九月人民政協會議的意義與決議傳達到各地教會。於是吳耀宗便與協進會磋商，聯合組成「基督教訪問

¹² 沈體蘭於一九二二年畢業於東吳大學，求學期間受洗。畢業後任青年會全國協會學校組幹事，一九二七年與吳耀宗發起組成中國基督徒學生運動籌委會。一九三一至四一年間任倫敦會麥倫中學（Medurst College）校長。九一八後，沈積極參加抗日運動。一九三八年，在中共地下黨領導下，與進步人士胡愈之、王任叔、吳耀宗、張宗麟等，在上海發起組織「星二聚餐會」。一九三八至四一年分別擔任中華基督教教育協會副會長及華東基督教教育協會會長。抗戰勝利後，重返麥倫中學任校長，此後積極支持反內戰、反獨裁運動。一九四九年九月以教育界代表身份參加人民政協會議，並任大會副秘書長。一九五〇年任華東教育部副部長。參陳一鳴、陳承融，〈沈體蘭先生傳略〉，吳漢民主編，《20世紀上海文史資料文庫》，第8輯（上海：上海書店，1999），頁128至134。另《上海宗教志》編纂委員會編，《上海宗教志》（上海：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頁730至731。

¹³ 吳耀宗，〈人民民主專政下的基督教〉，頁3。

¹⁴ 吳耀宗，〈人民民主專政下的基督教〉，頁3至4；另〈人民民主專政下的基督教（續）〉，《天風》，第177期（1949年8月27日），頁3至4。

¹⁵ 〈個人消息〉，《同工》，新3卷8期（1949年10月），頁140；新3卷10期（1949年12月），頁162。

¹⁶ 〈教會應改組全國機構實證耶穌福音〉，《協進月刊》，第8卷3期（1949年11月），頁2。

¹⁷ 編者，〈中國基督教協商會議〉，《天風》，第185期（1949年10月22日），頁1至2。

¹⁸ 〈協進會執委會重要決議〉，《天風》，第186期（1949年10月29日），頁12。

團」。¹⁹

十一月，《天風》首次報導了訪問團的消息，指爲了傳達人民政協的成果和中央人民政府有關宗教工作的政策，以及加深各地區教會領袖與政府當局的了解與合作，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中華基督教男女青年會全國協會及人民政協基督徒代表發起組織全國性的基督教訪問團。訪問團計劃訪問華東、華中、華北、東北、華南五區共十八個城市。關於訪問團的成員方面，主要團員爲是次參加政協會議的基督徒代表：吳耀宗、趙紫宸、沈體蘭、吳貽芳、鄧裕志、陳已生、張雪岩、劉良模等，另各負責機構選派代表參與。更特別的是，報導更指北京外國語學校校長浦化人²⁰將擔任特約訪問人。²¹

從訪問團的成員組成可見，雖然全國協進會是訪問團的發起人，但是政協基督徒代表的角色，已經凌架協進會之上。主要原因，是因爲訪問團涉及跟地方政府商討基督教會面對的困難，故政協代表的實質作用，遠比協進會的代表爲大。當然，我們也不用誇大協進會與政協代表的矛盾，當時前者也企圖藉著後者與政府的關係，可以強化自己的功能。事實上，他們邀請已脫教入黨的浦化人任特約訪問人，已反映出其希望與政府溝通的意願。不過，後來訪問團成行時，浦化人並無參與，這相信與其黨員背景有關。

訪問團首個目標地區是華中（包括杭州、南昌、長沙、漢口、武昌及開封），成員包括吳耀宗、劉良模（青年會全國協會事工組主任）、吳高梓（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會長）、涂羽卿（青年會全國協會總幹事）及艾年三（上海中華信義會）五人。華中訪問團於十一月十八日出發，十二月十五日結束。²²未幾，華東訪問團亦於十一月三十日出發，成員包括吳貽芳、沈體蘭、蔡葵、潘玉霖等、林永侯、胡祖蔭、陳已生、劉英麗等。²³

從華中區的訪問可見，訪問團在各地得到當地政府高規格的接待。吳耀宗也承認，訪問團對各地方最具體的貢獻，就是「幫助他們同地方當局取得這個聯繫」。湖北省政府在期間，甚至下了一個保護教堂的通令。²⁴筆者相信，地方政府如此重視訪問團，並不純粹是因爲其政協代表的關係，而是中央傳達的命令與要求，目的是要強化吳耀宗等愛國人士能夠扮演政府與教會間的「橋樑」形象，爲日後的基督教革新鋪路。

由於吳耀宗與《天風》的密切關係，解放後的《天風》已成爲鼓吹中國教會革新的重要輿論平台，凝聚及吸引了一群非教會領導核心的信徒。解放初期，吳耀宗邀請在上海青年會工作的鄭建業接任《天風》主編，積極倡導中國教會的改革。²⁵我們清楚可見，

¹⁹ 吳耀宗，〈基督教訪問團華中訪問記〉，《天風》，第 204 期（1950 年 3 月 11 日），頁 5。

²⁰ 浦化人原爲中華聖公會陝西牧區牧師，亦曾任基督將軍馮玉祥的隨軍牧師，一九二七年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一度以地下黨員身份在教會活動。但解放前已脫離教會工作。這位曾經有基督教背景的中共幹部，亦在《天風》發表文章，談論新中國基督教的革新任務。浦化人，〈新中國基督教會的任要任務〉，《天風》，第 260 期（1951 年 4 月 21 日），頁 1 至 2。《天風》編輯在文章前稱浦爲「我教會前輩」。

²¹ 〈基督教團體組織訪問團〉，《天風》，第 188 期（1949 年 11 月 12 日），頁 12。

²² 吳耀宗，〈基督教訪問團華中訪問記〉，頁 5。

²³ 〈華東訪問團已定期成行〉，《天風》，第 190 期（1949 年 11 月 26 日），頁 12。另〈華東區訪問團團員介紹〉，《天風》，第 191 期（1949 年 12 月 3 日），頁 12。

²⁴ 吳耀宗，〈基督教訪問團華中訪問記〉，頁 5。參〈政府尊重宗教信仰自由〉，《天風》，第 196 期（1950 年 1 月 14 日），頁 16。〈鄂省通令遵（尊）重教會房產〉，《天風》，第 212 期（1950 年 5 月 4 日），頁 12。

²⁵ 鄭建業，〈我敬愛吳耀宗先生〉，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編，《回憶吳耀宗先生》（上海：該會，1982），頁 133。另沈德溶，〈願《天風》爲建構「和諧社會」出力〉，《天風》，2005 年 3 月，頁 12。

「天風派」與「協進會派」對全國基督教會議的籌組，持有不同的立場。²⁶協進會派人士認為，全國協進會肩負發起、統籌大會的責任。雖然全國協進會並不代表所有宗派，但協進會派人士卻期望在原有協進會的基礎上，邀請其他宗派團體加入。他們指出，「協進會是責無旁貸地要領導發起這次全國會議」。²⁷相反，天風派卻認為，「這樣重要的全國性會議，並不是屬於那一個機關，或那一個公會，或那一個人的事」，而是屬於「大眾」的。²⁸鄭建業更指出，全國會議的出席代表，特別應注意平信徒及「少數在思想上領導的人物」的地位。²⁹儘管有著上述的分歧，但是協進會派與天風派在當時的矛盾仍未劇化。

一九五〇年一月廿四至廿七日，全國協進會舉行解放後的第二次執委會。議決於八月十九至廿七假燕京大學舉行全國基督教會議，總題為「基督教與新時代」，並提出三大目標：(一) 檢討基督教應有的改革計劃；(二) 協商基督教當前的事工綱領；(三) 加強基督教合作的機構組織。籌委會常務委員會成員包括：朱友漁（主委委員）、涂羽卿（副主任委員）、崔憲祥、邵鏡三、鮑哲慶、胡祖蔭、吳貽芳、鄧裕志、吳耀宗、樊互康等。³⁰後來，常務會議通過以朱友漁為主席，涂羽卿、鮑哲慶、崔憲祥、江長川為副主席，另吳高梓任總幹事。³¹吳耀宗雖名列籌委會成員，並負責宣言組工作，但卻未被授以重任，而最重要的革新計劃組，則由趙紫宸及江長川負責。趙、江兩人對中國教會的革新方向，顯然與吳耀宗迥異。

有感於協進會操掌全國基督教會議的企圖，天風派開始策動攻勢。二月，《天風》發表短評，擔心全會可能成為「一個例行公事應景的聚會」，編者說：

我們是來裝樣子革新呢？還是真心想革新？革到一些足以使我們感到括骨療毒之痛的地步時，我們捨不捨得下手開刀？我們通過這個宣言那個宣言後，到打算真按著它們來幹一場嗎呢？還是依然故我，誰也管不了誰？³²

政協基督教代表之一的張雪岩也指出，全會必須掌握在「真正民主革命者的手中」，他甚至強調，會議必須在北京召開，以期與中央政府、統戰部及政協全國委員會宗教事務組取得密切聯繫，並且這些部門「取得諒解」。³³種種跡象顯示，天風派對協進會企圖主導全會的作法有所不滿，並訴諸輿論來施予壓力。

三月廿八日，籌委會舉行第四次常務會議時決定，鑑於籌備工作「未能匆促間就序」，決定延期舉行全會。³⁴協進會的決定，反映出在籌組全會的過程中，就教會革新的方向，以及革新的領導等問題呈現的爭論。《天風》編者批評，有人不主張革新，也有人「假革新之名以保頑固之實」。為此，鄭建業特別輯集了對全會的意見，刊於《天風》

²⁶ 關於「天風派」及「協進派」的分歧，是張賢勇首先提出的。參張賢勇，〈無為之用——關於梁家麟文中的趙紫宸先生及其他〉，《建道學刊》，第 11 期（1999 年 1 月），頁 188。但張氏並沒有詳細作探討。

²⁷ 〈籌備全國會議機構是怎樣產生的？〉，全國基督教會議籌備委員會編，《全國基督教會議籌備情況報告》，第 1 號（1950 年 6 月），頁 5。

²⁸ 〈再論基督教協商會議〉，《天風》，第 192 期（1949 年 12 月 10 日），頁 1。

²⁹ 〈中國基督教協商會議〉，頁 2。

³⁰ 〈全國基督教會議的籌備〉，《天風》，第 199 期（1950 年 2 月 4 日），頁 12。

³¹ 〈歷次籌委會常務會議重要決議〉，全國基督教會議籌備委員會編，《全國基督教會議籌備情況報告》，第 1 號（1950 年 6 月），頁 7。

³² 〈全國基督教會議〉，《天風》，第 200 期（1950 年 2 月 11 日），頁 2。

³³ 張雪岩，〈我對基督教全國會議的意見〉，《天風》，第 200 期（1950 年 2 月 11 日），頁 4。

³⁴ 〈全國基督教會議延開〉，《天風》，第 209 期（1950 年 4 月 15 日），頁 12。

上。³⁵其中鄭新民批評全會的籌委都是「熟面孔」，多半是上了年紀的，領導中國教會有二三十年以上的宗派領導，³⁶在在反映出矛盾的所在。沈亞倫甚至呼籲，教會中的「革新同志」把保守派「丟在一邊」，另起爐灶，籌組全國革新教會同志委員會，召開會議，與政府直接聯繫，倡導中國教會的革新。³⁷同時，燕京宗教學院出版的《恩友團契月刊》，也對全會籌備過程中的「形式」作風，以及個別領袖的「個人英雄主義」傾向不滿，指其沒能深入群眾（平信徒和青年）。³⁸

五〇年四月初，華北訪問團宣佈組成，成員包括吳耀宗、劉良模、吳高梓、涂羽卿、崔憲祥（中華基督教會全國總會總幹事）、王梓仲（華北基督教聯合會總幹事）、鄧裕志（女青年會全國協會總幹事）等七人。³⁹四月十三日，訪問團自滬出發，行程包括濟南、北京、太原、西安、徐州。⁴⁰訪問團於四月十五至十八日訪問濟南後，即轉到北京計劃訪問五天，再赴太原。四月廿一日，訪問團在燈市口公理會召開座談會，許多與會代表反映各地教會遭遇的困難。三十日，吳、劉、鄧、涂、崔、王聯同趙紫宸（燕京宗教學院）、趙復三（北京青年會副總幹事）等與中共中央統戰部徐冰副部長座談宗教問題。吳耀宗很希望能夠在京與周恩來見面，把所了解各地基督教面對的困難反映，並要求中央人民政府下令保護基督教的活動。⁴¹周恩來答允接見，訪問團遂取消太原、徐州之行。⁴²當時另一成員艾年三，按原訂計劃從上海直赴太原會合。當他在五月一日抵達太原時，始得悉其他團員未能如期到達，結果太原的訪問由艾一人負責，但行程卻由四天縮為一天。隨後艾年三亦動身赴京，加入與周恩來的見面。⁴³

周恩來與基督教領袖座談

五月二日下午一時，周恩來在政務院接見了吳耀宗、劉良模、鄧裕志、崔憲祥、王梓仲、涂羽卿及江長川（華北基督教聯合會主席）等七人，中央人民政府內務部陳其瑗副部長在座。當時吳耀宗匯報了基督教一般的情況及目前的若干困難，周恩來發表談話後，提出下次約期再談。⁴⁴

周氏的談話開宗明義指出，百多年來基督教在華傳播的歷史，是同帝國主義侵略不可分割的，這也是中國人民反對基督教的主要關鍵。抑有進者，周氏更指出，「今天，美帝國主義仍企圖利用中國的宗教團體來進行破壞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活動」。因此，政府要求宗教團體必須「把民族反帝的決心堅決下去」，割斷同帝國主義的聯繫，「清算」近百年來同帝國主義的關係。他不諱言宗教唯心主義與唯物主義的不同，但卻重申政府不搞反宗教運動，只要求宗教團體「擺脫帝國主義的控制，肅清帝國主義的影響」，建立自治、自養、自傳的教會。⁴⁵

³⁵ 〈全國基督教會議延期召開〉，《天風》，第 210 期（1950 年 4 月 22 日），頁 1。

³⁶ 鄭新民，〈對全國基督教會議籌備工作的感想與意見〉，《天風》，第 210 期（1950 年 4 月 22 日），頁 6。

³⁷ 沈亞倫，〈「天國好像麵酵」〉，《天風》，第 210 期（1950 年 4 月 22 日），頁 4。

³⁸ 本社，〈談全國基督教會議籌備會擴大會議〉，《恩友團契月刊》，第 2 卷 5 期（1950 年 5 月），頁 1。

³⁹ 〈基督教訪問團訪問華北〉，《天風》，第 208 期（1950 年 4 月 8 日），頁 12。原先鄧裕志並不在名單上，後來加入。

⁴⁰ 〈基督教訪問團北上行程已定〉，《天風》，第 209 期（1950 年 4 月 15 日），頁 12。

⁴¹ 沈德溶，《吳耀宗小傳》（上海：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1989），頁 53 至 54。

⁴² 〈基督教華北訪問團返滬〉，《天風》，第 217 期（1950 年 6 月 10 日），頁 12。

⁴³ 〈艾年三牧師訪問太原教會〉，《天風》，第 215 期（1950 年 5 月 27 日），頁 12。另梁藝府，〈記基督教訪問團艾年三牧師獨訪太原〉，《天風》，第 217 期（1950 年 6 月 10 日），頁 10。

⁴⁴ 沈德溶，《吳耀宗小傳》，頁 54。

⁴⁵ 〈關於基督教問題的四次談話（1950 年 5 月 2 日-20 日）〉，《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

值得注意的是，周恩來在這次談話中提及了「三自」的原則。據劉良模憶述，當基督教人士向周提出教會的困難和要求時，周坦率地說中國基督教的困難是因為過去曾經被帝國主義利用，所以基督教與人民群眾間存在著一條鴻溝。新中國成立後，中國人民已經站起來了，周反問：「中國基督教為甚麼不能也站起來，辦自己的教會？」當時崔憲祥說：「對啊！好久以前，我們基督徒中間曾經主張由我們中國基督徒辦自治、自養、自傳的教會。」周恩來充份肯定自治、自養、自傳的原則，認為這樣可以解決基督教面對的困難。⁴⁶此後，「三自」便成為中央「革新」基督教及天主教的原則。

五月三日，吳耀宗與涂、劉、鄧、崔及北京教會領袖十多人在青年會商談下次與周見面時如何提出具體意見，眾人委托吳耀宗起草一個初步意見。五月四日，吳撰寫了〈關於處理基督教問題的初步意見〉，並於當晚與劉良模及鄧裕志在青年會商議如何修改。五日上午，吳氏又在青年會與二十餘位教會同道商討意見。⁴⁷

〈關於處理基督教問題的初步意見〉，全文包括五個重點：（一）關於肅清帝國主義力量提高民族自覺精神的辦法；（二）關於基督教團體之登記；（三）關於佔用教會房產之處理辦法；（四）關於宗教信仰自由之各種規定；（五）關於設立中央宗教機構問題。可見，當時吳耀宗等人最關心的問題，是新中國如何明確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以及相應的管理宗教措施等技術性問題。他們最大的期望，是請求中央政府下一個通令，要各地方人民政府嚴格執行共同綱領中宗教信仰自由的規定，以助解決基督教當前的問題。⁴⁸

五月六日，應周恩來之約，吳耀宗等再次到政務院作第二次座談。這次出席者除了上次七人外，增加了艾年三、楊肖彭（天津基督教青年會總幹事）、凌俞秀靄（北京女青年會董事會主席）、凌賢揚（中華聖公會北京區）、趙復三等。陳其瑗及有關部門負責同志十餘人也在席上，談話歷時三小時餘。⁴⁹這次見面，周恩來完全扭轉了問題的重心，並且清楚地陳明了黨國對基督教革新的期望。

周恩來再次重申「基督教最大的問題，是它同帝國主義的關係問題」，基督教必須「肅清其內部的帝國主義的影響與力量」，依照自治、自養、自傳的三自精神，提高民族自覺。另一方面，這次談話也具體觸及外國傳教士及捐款問題。周恩來清楚指出，「我們不再請外國傳教士到中國來，因為外國傳教士很容易不自覺地做帝國主義的工具」。至於現時留在中國的傳教士，政府並不要求他們馬上離開，「他們可以等到雙方合同期滿再走」。談到海外捐款問題，與會的教會人士反映出停止接受捐款的實際困難。對此，周恩來也作出了彈性的指示，就是「不應該再向外國募捐」，但也不「盲目排外」，只要沒有附帶條件，也可接受。最後，周恩來要求與會的教會人士可提出一些具體工作，說明基督教怎樣輔助社會進步，以及教會對政府的要求。⁵⁰

第二次談話後，吳耀宗按照周氏的要求，於五月七日及八日再與一些教會同道討論〈初步意見〉的修正稿。八日又與陳其瑗副部長交換意見。五月十日，全國政協宗教組舉行座談會，集中討論基督教情況，基督教方面共十六人參加。據沈德溶指出，會上主

1 冊，頁 220 至 222。

⁴⁶ 劉良模，〈統一戰線與中國基督教〉，中共上海市統戰部統戰工作史料徵集組編，《統戰工作史料選輯》，第 4 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頁 39。

⁴⁷ 沈德溶，《吳耀宗小傳》，頁 54。

⁴⁸ 吳耀宗，〈展開基督教革新運動的旗幟〉，《天風》，第 233-234 期（1950 年 9 月 30 日），頁 15。

⁴⁹ 沈德溶，《吳耀宗小傳》，頁 54。

⁵⁰ 〈關於基督教問題的四次談話〉，頁 222 至 223。

要討論的議題，仍是基督教應如何肅清帝國主義的力量。⁵¹會上，陳其瑗傳達了周恩來的指示，指政府要求宗教界在政治上合作，而不求思想上的一致。浦化人也有出席發言。⁵²

十一日，吳耀宗又與涂、劉、鄧、艾、趙復三、凌俞秀靄等討論如何修改〈初步意見〉。下午，吳草擬修正稿，易名為〈中國基督教今後努力的途徑〉，打印後送呈周恩來。⁵³從〈關於處理基督教問題的初步意見〉，多番修訂，易名為〈中國基督教今後努力的途徑〉，在在反映出在這場黨國與基督教人士互動的過程中，黨國的意志如何改變，甚至是主導了基督教人士的構想。前者的重點是以保護宗教信仰自由為主體，要求政府落實這種基本權利，後者則是把基督教變成「問題」，並由中國基督徒朝著革新的方向努力，從而獲得基督教在新中國的生存權。這種轉變，相信是眾基督教人士在會面前始料不及的。當然，客觀政治環境是促成轉變的關鍵所在。

五月十三日晚上十一時，周第三次約見吳耀宗等十八人，包括：吳耀宗、鄧裕志、劉良模、涂羽卿、崔憲祥、王梓仲、艾年三、趙紫宸、陸志韋（燕京大學校長）、江長川、高鳳山（北京匯文中學校長）、龐輝亭（又名龐之焜，北京公理會）、趙復三、陳文潤（北京女青年會總幹事）、凌俞秀靄、劉維誠（上海基督教公誼會）、楊肖彭、霍培修（天津市基督教公理會）。這次談話長達四個半小時，到次日凌晨三時半才結束。⁵⁴

周恩來再次要求基督教人士與政府合作，他強調有神論者與無神論者，唯心論者與唯物論者之間，也可以在政治上合作。周氏明確提出：

我們必須在宗教界肅清帝國主義的影響。這不是誰來約束誰，我們大家都有這個責任。在宗教界肅清帝國主義影響，並不是說宗教界的每一個人人都做了帝國主義的工具。在個人來說自己感覺沒有被利用，但是帝國主義主觀上有所要求，它們利用宗教團體，乃是事實。廣大教徒有時不免也被利用。這一點，我們非說清楚不可。這個問題說清楚了，對教會只有好處。

針對教會人士的憂慮，周恩來重申政府不是要消滅宗教，只是要把「宗教界的害群之馬、極少數走狗，猶大，清除出去」。顯然，與會的部分教會領袖對帝國主義利用宗教團體的問題，仍有保留。對此，周氏作出解釋：

分清主觀與客觀，客觀上是存在了的；分清少數與多數，事實上反動分子是極少數。宗教界要通過自我批評，把自己的工作與組織進行檢討和整理。這是個原則性的工作。我們搞清楚這些原則，把這件工作做好了，帝國主義就不能再利用宗教團體了。這也就是宗教界的自衛。

周恩來在這次談話中，清楚揭示了黨國的底線，基督教內的中間派人士必須「去腐創新」，與愛國及進步人士站在一起，在政治上與政府合作，肅清帝國主義影響，割斷帝國主義關係，從而孤立以至打擊帝國主義分子；否則，一旦錯失這個被團結的機會，自身也成爲鬥爭的對象。誠如周恩來所言：「我們的統一戰線要擴大，其界限要看是否同

⁵¹ 沈德溶，《吳耀宗小傳》，頁 55。

⁵² 巨贊，〈一年來工作的自白（續完）〉，《現代佛學》，第 1 卷 2 期（1950 年 10 月），頁 21。

⁵³ 沈德溶，《吳耀宗小傳》，頁 55。

⁵⁴ 沈德溶，《吳耀宗小傳》，頁 55。吳耀宗則指共十九人參加是次座談，另加鄭錫三（天津循道公會兼華北教區主席），吳耀宗，〈展開基督教革新運動的旗幟〉，頁 13。

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割斷了關係」。「諸位在政治上站穩了陣腳，便毫不會受到歧視，只有這樣才是出路」。⁵⁵

吳耀宗在日記中寫道：

周總理態度非常公允，雙方兼顧，令人佩服。我們在和周總理談話中得到一個啟發，這個啟發就是，基督教應當自動地肅清帝國主義在它裡面的力量和影響。⁵⁶

值得注意的是，吳耀宗個人早有肅清基督教的帝國主義影響的想法，他所強調的「啟發」，相信是從其他基督教人士的角度來闡釋。正如他後來這樣總結與周恩來的三次談話：

周總理談話的中心，卻在指出基督教同帝國主義的聯繫，和帝國主義在目前國際形勢中利用基督教去進行反革命工作的事實與可能。基督教同帝國主義的關係這個題目，在參加談話的基督教人士當中，並不是完全新鮮的。然而，周總理所做的清楚的分析，卻給了我們一個深刻的印象，和鮮明的啟示。這個啟示是甚麼呢？用一句簡單的話來說，這個啟示就是：「基督教應當自動地肅清帝國主義在它裡面的力量和影響。」一個沒有參加談話的讀者，是不容易了解這句話的涵義的。⁵⁷

基督教與帝國主義的關係，原來只是吳耀宗個人的意向，也廣為其他基督教人士熟悉（「這個題目，在參加談話的基督教人士當中，並不是完全新鮮的」）。但經過周恩來的談話後，吳耀宗的立場，已被賦予了政治的正統性，成為黨國的基本政策。（「一個沒有參加談話的讀者，是不容易了解這句話的涵義的」）。

筆者相信，在京期間周恩來已指示他要發表這篇對外宣言，並且要爭取更多教會領袖聯署，以期達到果效。十五日，吳耀宗、劉良模、涂羽卿、艾年三四人離開北京，繼續到西安訪問。吳在火車上再次修改〈基督教今後努力的途徑〉一文，⁵⁸並把這個修訂稿傳到北京，再轉呈周恩來。

五月二十日，中共中央、政務院有關部門召開座談會，討論吳耀宗擬定的宣言第五修正稿。周恩來在會上表示，第五次修正的宣言，「比過去多了一個序言，把基督教同帝國主義的關係說得很偶然，就讓他那樣吧。一個字不改，照樣發表。宣言裡的話和我們的話不一樣，我們也不需要宣言和我們說的一樣。這樣便於團結群眾」。周恩來在談話時已用「宣言」來形容吳的文件，在在說明他在京時，已向吳作出了發表宣言的指示。

周恩來接著對負責宗教工作的幹部說：基督教工作的「政策」，一方面不能無原則地團結，但另一方面也不要脫離廣大群眾。他語重心長地說：要團結多數，爭取中間分子，打擊極少數反動分子，「但也不能過急」。⁵⁹

⁵⁵ 〈關於基督教問題的四次談話〉，頁 224 至 226。

⁵⁶ 轉引自沈德溶，〈一位堅貞愛國的宗教界領袖——吳耀宗〉，中共上海市統戰部統戰工作史料徵集組編，《統戰工作史料選輯》，第 4 輯，頁 50。

⁵⁷ 吳耀宗，〈展開基督教革新運動的旗幟〉，頁 13。

⁵⁸ 沈德溶，《吳耀宗小傳》，頁 55。

⁵⁹ 〈關於基督教問題的四次談話〉，頁 227。

革新宣言

五月廿九日，吳耀宗等返抵上海。⁶⁰當吳耀宗在西安訪問時，匆匆地把宣言的第五修正稿寄給國內數十位同道，請他們簽名支持。⁶¹據接待吳耀宗的西安青年會總幹事田景福憶述，吳氏在西安時向他提及與周恩來的談話及宣言問題，田氏亦願意支持。⁶²筆者相信，吳耀宗這時已開始邀請更多教會領袖在公開宣言上聯署作發起人，但仍未發展到後來的簽名運動。

吳耀宗回到上海後，訪問團的工作便完全停頓。他沒有再按原訂計劃到東北及華南訪問。因為他主要關注的議題，已不是在各地收集基督教會面對的困難及問題，及扮演當地教會與政府間的「橋樑」。相反，他必須說服更多基督教人士認同，基督教自我革新的唯一出路，就是謀求更高層次的政治解決。

那邊廂，全國協進會於五月中旬又宣佈於八月舉行籌備會擴大會議（即全會的預備會）。⁶³六月，籌委會再次把擴大會議的日期延至秋天舉行，地點亦由北京改為上海。⁶⁴筆者相信，協進會領導業已感受到周恩來對教會革新所作的要求及壓力，乃決定召開全會的擴大籌備會議。而會議從北京移至上海舉行，也說明協進會派意圖更有效地控制全會的操作。

六月三日，青年會、女青年會、全國基督教協進會、上海基督教聯合會、上海傳道人聯誼會等舉辦的歡迎華北基督教訪問團晚會，共六百多人參加。會上，吳耀宗與劉良模分別報告了此次在京與周恩來談話的經過與內容。⁶⁵六、七月間，吳耀宗主要的工作，就是要爭取更多教會人士支持宣言。據鄭建業憶述，吳耀宗常分別邀約各方面教會人士在其家或辦公室懇談，而鄭在整個起草過程中，也提供了很大的協助。⁶⁶

爲了爭取更多教會領袖聯署作發起人，吳對部分意見作了讓步，例如原來有一條「基督教團體應以不用外籍人員爲原則，其實行辦法應與政府協商規定之」，他接納了上海基督教領袖的意見，修改爲「中國基督教教會及團體，凡仍仰賴外國人才與經濟之協助者，應立即擬定具體計劃，在最短時期內，實現自力更生的目標」。後來，他又把「立即」兩個字刪去，避免予人立即要割斷外國的經濟關係的誤解。此外，他又把原來第五修正稿的序言提及與周總理談話的經過整段取消，改爲強調宣言本身的意義的引論。引論一開始首先肯定了基督教對中國社會曾經有過的貢獻，只是後來「在有意無意、有形無形之間」，與帝國主義發生了關係。同時，北京教會領袖也把引言中「又因爲把基督教傳到中國來的國家，主要的都是這些帝國主義的國家」，改爲「又因爲把基督教傳到中國來的人們，主要的都是從這些帝國主義國家來的」。⁶⁷

不過，吳耀宗對於宣言的基本觀點——基督教與帝國主義的關係，卻是堅持不變。江文漢指出，宣言的基本方針，就是「認識帝國主義利用基督教的事實，肅清基督教團體的帝國主義影響，警惕帝國主義，尤其是美帝國主義，利用宗教以培養反動力量

⁶⁰ 〈基督教華北訪問團返滬〉，頁 12。

⁶¹ 吳耀宗，〈展開基督教革新運動的旗幟〉，頁 16。

⁶² 關於訪問西安的情況，參田景福，〈我與三自愛國運動〉，氏著，《田景福三自文選》（西安：陝西省基督教兩會，1990），頁 4 至 9。

⁶³ 〈全國基督教會議的近訊〉，《天風》，第 214 期（1950 年 5 月 19 日），頁 12。

⁶⁴ 〈全國基督教會議的消息〉，《天風》，第 219 期（1950 年 6 月 24 日），頁 12。

⁶⁵ 沈德溶，〈吳耀宗先生在上海〉，氏著，《在三自工作五十年》（上海：中國基督教全國兩會，2000），頁 159。

⁶⁶ 鄭建業，〈我敬愛吳耀宗先生〉，頁 135 至 136。

⁶⁷ 吳耀宗，〈展開基督教革新運動的旗幟〉，頁 16。

的陰謀」等內容，引起了極大的反對。六月六日，青年會舉行宣言的討論會，就有參與者激烈反對。七月廿六日，二十多位協進會行政人員要求吳把宣言內指摘帝國主義的條文刪除。⁶⁸吳耀宗指出，有牧師簽名時提了一個附帶條件，就是要把宣言中關於基督教與帝國主義關係的內容刪掉，但為吳所拒絕，結果他把簽名撤回。⁶⁹

再者，吳耀宗也把第五修正稿內最後一條「基督教在地方上所發生的問題，如教堂被佔用等，得由有關之基督教團體隨時向地方或中央人民政府報告，由政府處理之」刪去。因為他認為如果基督教在新時代中的基本問題沒有得到解決，其他問題也就不能獲得滿意的解決。相反，如果基督教與帝國主義的關係解決了，其他問題也就迎刃而解。⁷⁰

「革新宣言」包括前言、總的任務、基本方針及具體辦法四部分。前言主要承認基督教在傳入中國的百多年歷史中，同帝國主義，「在有意無意、有形無形之中發生了關係」。即使新中國成立後，帝國主義仍然企圖利用基督教來進行破壞。換言之，中國教會今後的總任務，就是要徹底擁護共同綱領，在政府領導下，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及官僚資本主義，為建設新中國而奮鬥。基本方針包括兩方面，一是中國教會必須承認過去被帝國主義利用的事實，肅清「基督教內部的帝國主義影響」；二是要在短期內實現自治、自養、自傳作為基督教革新的目標。至於具體辦法，則要擬定具體計劃，探討如何在短期內實現自力更新，並且在宗教及一般工作上，改進教會。⁷¹

三．革新宣言簽名運動及其反響

簽名運動

七月廿八日，吳耀宗把最後（第八修訂）稿定名為〈中國基督教在新中國建設中努力的途徑〉，連同他已取得四十位基督教人士聯署發表，寫信給全國一千多位基督教負責人士，徵求其以個人名義簽名支持。⁷²基督教革新宣言簽名運動於焉展開。

在〈文件發起人致全國同道的信〉中，吳耀宗強調，這是一篇「對外的宣言」，目的是要表示基督教在新時代中的立場。值得注意的是，他在重申簽名是「以個人資格」的行為時，又要求各人把自己服務的機構和擔任的職務註明。儘管吳指這並不表示簽名者是代表那個機關，而在讓外界人士明白其在基督教裡面的身分。但他企圖以這種「個人名義」來增加宣言的代表性，確是不言而喻的。他又透露正計劃擬定一個對國內基督徒同道的宣言，以及一個對外國宣教會及基督徒的宣言。⁷³不過，這兩個宣言似乎並沒有如期完成。

綜觀這四十位發起人的背景如下：

背景	姓名／職務	人數／比例
青年會及女青	江文漢（全國協會副總幹事）、吳耀宗（全國協會出版組主任）、	10 人

⁶⁸ 江文漢，〈吳耀宗——中國基督教的先知〉，《回憶吳耀宗先生》，頁 53。

⁶⁹ 李儲文記，〈吳耀宗先生在北京各教會聯合禮拜的傳達〉，《同工》，新 5 卷 5 期（1951 年 5 月 1 日），頁 54。

⁷⁰ 吳耀宗，〈展開基督教革新運動的旗幟〉，頁 16。

⁷¹ 〈中國基督教在新中國建設中努力的途徑〉，《天風》，總 233 至 234 號（1950 年 9 月 30 日），頁 2。

⁷² 吳耀宗，〈展開基督教革新運動的旗幟〉，頁 16。這四十位發起人中，具青年會背景者佔 11 人。

⁷³ 〈文件發起人致全國同道的信〉，頁 3。

年會	涂羽卿(全國協會總幹事)、孫王國秀(女青年會全國協會執委會主席)、凌俞秀靄(北京女青年會董事會主席)、陳文潤(北京女青年會總幹事)、楊肖彭(天津青年會總幹事)、趙復三(北京青年會副總幹事)、鄧裕志(女青年會全國協會總幹事)、劉良模(全國協會事工組主任)	(25%)
協進會或其他聯合組織	王吉民(上海協進會醫事委員會總幹事)、林永俣(全國協進會幹事)、胡翼雲(廣東協進會總幹事)、繆秋筌(全國協進會幹事)、王梓仲(華北基督教聯合會總幹事)、江長川(華北基督教協會主席)	5人 (12.5%)
衛理公會	丁先誠(衛理公會福州年議會宗教教育總幹事)、陳芝美(福州衛理公會華南區教育委員會總幹事)、吳高梓(上海衛理公會牧師)	3人 (7.5%)
中華基督教會	汪彼得(中華基督教會廣東協會總幹事)、招觀海(中華基督教會廣東協會幹事)、崔憲詳(中華基督教會全國總會總幹事)	3人 (7.5%)
浸禮會	戚慶才(上海浸禮會懷恩堂牧師)、鮑哲慶(浙滬浸禮會總幹事)	2人(5%)
循道公會	熊真沛(循道公會華南教區主席)、蕭國貴(循道公會湖北教區主席)	2人(5%)
其他宗派	龐之焜(北京公理會牧師)、艾年三(上海中華信義會牧師)、邵鏡三(南京中華基督會總幹事)	3人(7.5%)
神學院校	陳崇桂(重慶神學院院長)、趙紫宸(燕京宗教學院院長)	2人(5%)
教會學校	王世靜(福州華南女子文理學院院長)、方叔軒(成都華西大學校長)、韋卓民(武昌華中大學校長)、高鳳山(北京匯文中學校長)、陸志韋(燕京大學校長)、檀仁梅(福州協和大學文學院院長)	7人 (17.5%)
其他	黎照寰(上海基督教公誼會主席)、劉維誠(上海道濟醫院總務主任)、鄭建業(《天風》編輯)	3人(7.5%)

吳氏指出，這四十人主要包括了大部分在北京參與了與周恩來談話的人士（名字下劃線者）。⁷⁴從上表可見，發起人以青年會背景人士佔比例最高（25%），若把青年會及其他教會附屬機構（包括教會學校）一併計算，則教會附屬事業的比例，更高達五成。至於餘下的教會領袖方面，均具西方差會背景，多為主流宗派，包括中華基督教會、循道公會、衛理公會、浸禮會、信義會及公理會等。至於神學立場上傾向屬靈派者，僅陳崇桂一人而已。⁷⁵

吳耀宗對這四十人的背景，顯然也不盡滿意。「如果時間許可，我們是應當徵求更多的同道做發起人的，但因為我們不願意把宣言發表的日期拖得過長，我們就只好不為這件事多化時間」。⁷⁶為何吳耀宗的時間那麼緊逼呢？筆者相信，這與預計在秋天召開的全國基督教會議擴大會議有關，顯然，中共及吳耀宗均欲搶先在會議召開前，發表宣言，爭取主導基督教界對革新的輿論方向。

其實，儘管吳耀宗對四十人的背景有所不滿，但是他實際上已經成功爭取全國基督教會議的重要籌備者任發起人：趙紫宸（革新計劃組）、江長川（副主席，革新計劃組）、鮑哲慶（副主席，事工綱領組）、涂羽卿（副主席，事工綱領組）、邵鏡三（合作機構組）、崔憲祥（副主席，宣言組）、吳高梓（總幹事）、林永俣（副總幹事）、王梓仲（駐京幹事）。除了主席朱友漁及副總幹事蔡智傳、李延魁外，整個全會的籌委會差不多也成為

⁷⁴ 吳耀宗，〈展開基督教革新運動的旗幟〉，《天風》，總 233 至 234 號（1950 年 9 月 30 日），頁 16。十九位與周恩來談話的京津教會人士中，除了三人（鄭錫三、霍培修、龐輝亭）外，均擔任了宣言的發起人。

⁷⁵ 有關陳崇桂的情況，可參邢福增，《中國基要主義者的實踐與困境——陳崇桂的神學思想與時代》（香港：建道神學院，2001），頁 235 至 245。

⁷⁶ 吳耀宗，〈展開基督教革新運動的旗幟〉，頁 16。

革新宣言的發起人。⁷⁷上述教會人士，肯定充份掌握協進會與吳耀宗間的張力，特別是兩者在革新基督教的方向，以及對基督教與帝國主義關係的理解上的差異，故他們同意把自己的名字放在發起人名單上，與其說是由於他們被吳所說服，毋寧是出於他們對政治形勢發展的回應。吳高梓於六月間，堅決辭去籌委會總幹事一職，相信與此不無關係。⁷⁸

據吳耀宗指出，他最初僅計劃把宣言發表，並無打算將之變成廣泛的簽名運動，但他沒有進一步解釋是甚麼原因促使他改變心意，只是輕描淡寫地說「我們便覺得我們有一件必須做的事——我們應當發表一篇對外的宣言」。⁷⁹其實，箇中的關鍵在於周恩來的部署與指示。筆者據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主編的《周恩來年譜》，可見周氏於六月一日致電吳耀宗，內文表示：吳所寄來的〈中國基督教今後努力的途徑〉一文，「基本方針是好的。它打開了中國基督教會及其團體今後在《共同綱領》基礎上在人民政府領導下的新的努力途徑」，期望以此精神「勸導中國基督教代表人物響應這一主張，以利基督教會的革新」。⁸⁰可見，吳耀宗離開北京後，把再次修改的宣言發給周恩來。而周在回覆的電函中，便要求吳氏爭取教會代表人物簽名作響應。

周恩來授意把宣言變成簽名運動，主要目的是要用動員群眾表態的手法，逼使教會領導層接受黨國所期許的革新方向，並藉此確立吳氏在基督教革新運動裡的領導地位，把西方傳教士及與外國差會關係密切的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的影響力排除。值得注意的是，政府一直密切關注宣言及簽名運動的發展，並動員各地力量作出支持，⁸¹當時黨國最高領導人毛澤東也對此表達關注。毛在七月十九日就宣言向周恩來批示，請周「考慮用內部文件方式電告各中央局及各省市，並要他們注意贊助」。⁸²另一份中央文件也指出：

我們正鼓勵基督教中有愛國心的分子吳耀宗等，簽名發表宣言，號召以逐漸脫離帝國主義的影響與經濟關係，實行自治、自傳、自養為教會今後的目標。對於這個簽名運動，各地的黨政機關和人民團體應從旁予以適當的贊助，經過適當關係，組織有愛國心的教徒，簽名響應，並在教徒中進行宣傳。⁸³

這裡提及的「贊助」或「適當關係」，相信是指由各地黨委直接出面游說教會人士表態支持，或是間接通過在基督教界作地下工作的黨員，以及各地由中共領導的「青聯」（青年聯合會），策動及組織愛國心的信徒（特別是青年信徒）支持簽名運動。⁸⁴前者是上層領袖的工作，後者是信徒群眾的工作。此外，各地政府代表亦會出席宣傳宣言的座談會，

⁷⁷ 籌委會的名單參〈基督教會議的籌備近況〉，《天風》，第 205 期（1950 年 3 月 18 日），頁 12。

⁷⁸ 〈歷次籌委會常務會議重要決議補充報告〉，全國基督教會議籌備委員會，《全國基督教會議籌備情況報告》，第 2 號（1950 年 7 月），頁 4。其實，吳高梓原來亦為全國協進會的總幹事，但他早於五〇年三月亦堅決請辭。參〈協進會吳總幹事辭職訊〉，《天風》，第 205 期（1950 年 3 月 18 日），頁 12。

⁷⁹ 吳耀宗，〈展開基督教革新運動的旗幟〉，頁 15 至 16。

⁸⁰ 中共中央文獻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1951 年 6 月 1 日，上卷，頁 45。

⁸¹ 陸定一也強調，政府出面支持宗教界的革新運動是十分重要的，沒有地方政府首長參與及出面，宗教人士根本不敢進行革新。參陸定一，〈爭取團結廣大群眾，肅清帝國主義在中國的文化侵略的影響〉，《歷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概況和文獻》，頁 48。

⁸² 〈對吳耀宗等的中國基督教會三自宣言的批語（1950 年 7 月 19 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 1 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78），頁 438。

⁸³ 〈中共中央關於天主教、基督教問題的指示〉，頁 410。

⁸⁴ 參中華全國青年聯合會網，http://www.qinglian.org/about/qinglian_gyql_in.jsp#lsyg3。

發表講話，呼籲更多信徒熱烈擁護簽名。⁸⁵

九月六日，中共中央華東局統戰部向毛澤東在上呈關於吳耀宗、劉良模發起的三自宣言簽名運動的各方反映報告，毛於九月八日再次就三自宣言向周恩來下批語，謂「此事不宜太急，太硬性，致失去團結較多的人的機會，造成對立，對吳劉運動開展不利，請設法影響吳劉」。⁸⁶從毛的批示可見，除了吳耀宗外，劉良模的角色不容忽視，起碼從黨中央的角度觀之，整個簽名運動是吳耀宗與劉良模共同推動的，此其一。同時，吳、劉運動的步伐似乎有急進的傾向，令中央擔心造成教會內部的對立，不利團結。於是下令放緩。這亦間接說明了吳劉與協進會間的矛盾與鬥爭。此其二。華東局統戰部與吳、劉之間，在三自宣言一事上已建立了密切的組織聯繫。此其三。

值得注意的是，三自宣言簽名運動仍是基督教界內部的事情，主要是由吳、劉等致函予各全國及地方教會領袖，請其在所屬團體內呼籲支持。簽名運動從七月起開始推展，第一批簽名於八月底截止，共收到 1527 個名字。⁸⁷【圖表一】整理了首批簽名人士的背景，有助我們了解當時各地教會人士的反應。

從【圖表一】可見，簽名運動的主要支持來自基督教團體及組織：男女青年會（20%）、全國組織及區域組織（5%）、基督教附屬事業，如教育、醫療、出版等（24%）。至於宗派方面，耶穌家庭成為簽名運動的主要支持者（25%），其次為中華基督教會（5%）。地域背景方面，由於耶穌家庭的因素，山東省的支持者最眾（27%），其次為上海（12%）及廣東（10%）。

儘管吳耀宗已取得協進會內較重要人物的簽名，但要把革新宣言變成一統全國各地不同的宗派的共識，顯然仍面對著極大的困難。中華聖公會朱友漁主教後來更說：宣言是由「人數不足一打的一小撮男女」，抑且「當中多數是和教會不接近的」，擅自代表基督徒來發言。⁸⁸如何讓簽名運動得到更廣泛的支持，強化宣言的代表性，因而成為吳、劉，甚至是中央密切關注的情況。

對抗宣言

儘管吳耀宗取得四十位基督教人士擔任宣言的發起人，但是，簽名運動的推展，卻仍受到不同程度的抵制。田景福總結了針對宣言的三個問題：（一）許多教會早已自立自養自傳，宣言與他們沒有關係；（二）不認同基督教與帝國主義的關係；（三）高舉政教分離，基督徒不應參加政治活動。⁸⁹

毋庸置疑，來自保守派人士，特別是上海屬靈派的反對聲勢至為強烈。早於六月間，在四川中路青年會禮堂開會討論宣言時，基督徒聚會處倪柝聲也有出席，並以「信仰」為理由，反對革新宣言。⁹⁰一九五〇年九月，倪撰寫了〈我們的立場〉及〈對三自革新宣言〉兩篇文章，闡釋了其從「屬靈」原則對三自革新宣言持保留的立場。這兩篇文章

⁸⁵ 〈武漢教會領袖熱烈擁護基督教愛國人士最近發表的宣言〉，《信義報》，第 4 卷 19-20 期（1950 年 10 月），頁 10 至 11。

⁸⁶ 〈關於中國基督教三自宣言簽名運動的批語（1950 年 9 月 8 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 1 卷，頁 497。

⁸⁷ 吳耀宗，〈展開基督教革新運動的旗幟〉，頁 16。

⁸⁸ 朱友漁，《朱友漁自傳》（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1972），頁 226 至 227。

⁸⁹ 田景福，〈有關宣言簽名的三個問題〉，《天風》，第 242 期（1950 年 12 月 2 日），頁 2 至 3。

⁹⁰ 戚慶才，〈懷念愛國愛教的好榜樣吳耀宗先生〉，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編，《回憶吳耀宗先生》（上海：該會，1982），頁 189。

更傳達到各地聚會處的負責人，囑咐其對簽名運動採「不聽，不信，不傳」的態度。⁹¹

上海另一所屬靈派背景的教會——上海靈糧堂於七月收到三自宣言徵求簽名的信後，經七月卅一日的長執會議討論，最後決定以靈糧堂已經完成三自，及教會不應該介入社會上的政治活動為理由，不在宣言上簽名。⁹²

北京方面，不少自立教會對宣言也予以抵制。例如北京基督徒會堂的王明道在閱畢宣言內容後，「痛斥今日一般人之無節操、人格、廉恥、良心」。⁹³他認為，「革新運動宣言係與西人有關之教會所發，我人與西差會無關，切不可參加」⁹⁴畢詠琴也認為自己與外國差會沒有關係，所以不用參加簽名。⁹⁵

簽名運動開展後，《天風》亦收到多封來信，反映部分信徒對革新宣言強調基督教與帝國主義關係的不滿，這些來信均由劉良模負責回答。⁹⁶

與此同時，儘管全國協進會不少重量級人物均已聯署任發起人，但這並不代表他們完全認同宣言的內容，⁹⁷我們可見，協進會對簽名運動，仍企圖部署抵制與反擊。

七月下旬，協進會宣佈，由於全國會議與協進會第十四屆年會的日期接近，為精簡節約起見，把全會併入年會內。⁹⁸協進會這個決定，美其名是合併會議，但實際上是停開全會。當時《恩友團契月刊》便在社論裡批評全國會議的使命與協進會年會的使命不盡相同，如今這個合併的決定，等於停開全會。⁹⁹為何協進會要把全會併入年會？筆者以為，一方面，是他們考慮到全國基督教會議的籌備工作實際上已被吳耀宗的革新宣言所「架空」，全會的召開已失去其意義。另一方面，是協進會仍企圖在自己的體制內，提出其教會革新的方向，抗衡吳耀宗的宣言。

其實，全國協進會當時的處境也很微妙。自吳高梓於四月底辭去總幹事一職後，常務委員會委派副總幹事海維德（Victor E. W. Hayward）及各部主任幹事組織會務會議。七月，海維德提出辭職，十八日常務會議接納，並決議另組會務委員會暫代會務。新委員會由五人組成：繆秋笙（主任委員）、歐陽旭明、宓錫通、潘玉秣、王稼書。¹⁰⁰海維德的請辭，是因為他已得悉中央政府不欲西人在解放後仍擔任重要職務的政策。不過，海氏的離職只屬表面，實際上他對協進會的會務，仍有很大的影響力。

⁹¹ 黑龍江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黑龍江省·宗教志》（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9），頁 270。

⁹² 周福慶，〈控訴美國侵略工具趙世光〉，《天風》，第 270 期（1951 年 6 月 30 日），頁 11。另陸傳芳，〈在學習中認識三自，在工作中理解三自〉，上海市基督教兩會編，《上海基督教紀念三自愛國運動 50 週年神學思想建設研討會專輯》（上海：該會，2000），頁 15 至 16。

⁹³ 王明道日記，1950 年 9 月 26 日。

⁹⁴ 王明道日記，1950 年 12 月 17 日。

⁹⁵ 畢詠琴，〈我對三自愛國運動的認識〉，《天風》，1983 年 2 期，頁 16。

⁹⁶ 〈天風信箱〉，《天風》，第 227 期（1950 年 8 月 19 日），頁 9；劉良模，〈關於帝國主義與基督教〉，《天風》，第 230 期（1950 年 9 月 9 日），頁 2 至 3；劉良模，〈「警惕」是否「過火」？〉，《天風》，第 232 期（1950 年 9 月 23 日），頁 4 至 5。

⁹⁷ 劉良模這樣說：「有極少數教會人士抱了『兩面派』態度，他們在宣言上簽了名，對外國傳教士他們卻表示簽名實在是『出於無奈』。有些教會領袖，自己簽了名，卻不推動別人簽名；他們以怠工的方式來敷衍了事，來阻撓革新運動的發展」。劉良模，〈割斷與美帝國主義的關係，實行基督教三自革新〉，《同工》，新 5 卷 5 期（1951 年 5 月），頁 50。

⁹⁸ 〈全國基督教會議決停開〉，《天風》，第 225 期（1950 年 8 月 5 日），頁 12。

⁹⁹ 〈再退一步希望〉，《恩友團契月刊》，第 2 卷 8 期（1950 年 8 月），頁 1。

¹⁰⁰ 〈協進會組成會務委員會〉，《天風》，第 224 期（1950 年 7 月 29 日），頁 12。

新成立會務委員會的主要工作，就是籌備一九五〇年十月十八至廿五日間召開的十四屆年會。是次年會從籌備到召開，在在反映出協進會與吳耀宗間的角力，也說明了革新教會的不同路線。從現有資料可見，協進會用盡一切辦法，企圖作出最後的頑抗。

當時海維德要求繆秋笙負責於年會上，發表一份〈致全國信徒書〉，從宗教立場談三自革新，以針對吳耀宗宣言。協進會更把進一步吳耀宗排除於宣言委員會的名單之外。同時，爲了確保年會的方向能符合協進會的構想，他們也希望按照協進會原有的憲章，保留傳教士的出席資格。當時涂羽卿曾建議擴大特約代表人數，但被會務委員會以與憲章不符而拒絕。此外，繆秋笙亦同意由海懷德擔任年會的程序委員會執行幹事，並接納海氏的建議，在年會程序中排除了討論吳耀宗的革新宣言，改爲原有全國基督教會議預備的「教會革新問題」作分組討論資料。在年會主席團名單上，協進會最初只限於鮑哲慶（主席）及吳貽芳、涂羽卿（副主席），計劃把吳耀宗也排除在外。但後來於常委會上，始因應部分委員的堅持而加入吳，但同時也增加了數人以作緩衝。¹⁰¹

可以說，協進會十四屆年會是協進派人士與吳耀宗等爭奪基督教代表權及革新方向的最後戰場。而黨國更在幕後甚至幕前扮演操掌及裁斷勝負者的關鍵角色。

黨國的保駕護航

筆者相信，就在毛澤東九月八日的批示後，中央根據形勢的發展，特別是基督教界對吳、劉運動的抵制，決定全面主導及介入簽名運動。九月十五日，周恩來指示上海副市長潘漢年及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長夏衍，並轉告吳耀宗，「此項文件，擬予全部發表」，並提出將由《人民日報》「爲文贊助，以廣影響」。¹⁰²於是，《人民日報》於九月廿三日用第一版顯著地發表了宣言全文，並把第一批簽名人名單全部登出。同時，又特撰題爲〈基督教人士的愛國運動〉的社論，爲宣言造勢。社論肯定基督教人士的愛國運動，並高度評價簽名運動：

我們歡迎基督教人士所發起的自治、自養、自傳運動。這是基督教人士應有的使中國基督教脫離帝國主義影響而走上宗教正軌的愛國運動。他們號召割斷與帝國主義的關係，實行自力更生，使教會從外國人的機關改變為中國的機關，從而也使教會所舉辦的事業不再是服務於帝國主義利益的事業。這個運動的成功，將使中國的基督教獲得新的生命，改變中國人民對於基督教的觀感，因為他們使自己的宗教活動和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活動劃清了界線，而不互相混淆。¹⁰³

從社論的調子可見，政府爲宣言保駕護航，使之成爲基督教界共識的立場，可謂昭然若揭。

次日，上海《大公報》、《文匯報》、《新聞日報》等也將宣言刊出。九月廿六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在基督教、天主教中開展響應〈基督教宣言〉運動的指示〉。¹⁰⁴九月

¹⁰¹ 繆秋笙，〈美帝國主義怎樣通過基督教協進會破壞三自革新運動〉，《協進》，新1卷1號（1951年6月），頁10至11。

¹⁰² 《周恩來年譜（1949-1976）》，1951年9月15日，上卷，頁79。

¹⁰³ 〈基督教人士的愛國運動〉，《人民日報》，1950年9月23日。

¹⁰⁴ 吳建國等編，《當代中國意識形態風雲錄》（北京：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頁88。原文件未見，筆者從一位年長的教會人士口中，得悉這文件從中央下發到不同地方，要求各地方黨委發動支持。

三十日出版的《天風》，亦特闢宣言專號，詳細評論事件。可見，在中共精心策劃及部署下，宣言運動的性質，便從吳耀宗個人發起的簽名事件，變成得到政府全力支持的愛國運動。教會內部不同路線的差異，由是成爲是否愛國的政治選擇。此舉對於清除基督教界對宣言的抵制，無疑有極大的果效。各種不同的意見，由是整合在黨國的愛國要求之下。

在黨國高調支持下，協進會年會的宣言委員會的起草工作完全無法開展。繆秋笙指出，當時沒有同工願意擔任宣言委員會的幹事，更不願意負責起草，宣言一事無形中就「擱淺」了。¹⁰⁵江文漢憶述，起草委員鑑於簽名運動蓬勃展開的「形勢」，因而有了「戒心」，每次開會都推說有事不來。¹⁰⁶江氏所指的形勢，無疑是指黨國爲吳、劉的造勢與壓力。

在瓦解了反吳、劉的宣言部署後，黨國更直接插手干預十四屆年會的方向與操作，企圖進一步影響協進會系統。十月九日，華東軍政委員會召開座談會，基督教方面應邀出席者包括：吳耀宗、繆秋笙、江長川、吳高梓、涂羽卿、江文漢、艾年三、劉良模、陳見真、邵鏡三、鄭敬業等；而政府方面則有舒同（華東軍政委員會宣傳長）、潘漢年（上海市副市長）、周而復（華東局統戰部秘書長）、梅達君（統戰部幹部）、周力行等出席。政府代表陣容份量不輕，可見其君臨之勢。座談會最後對年會作出兩點規定：一、協進會執行委員會中的外籍委員不應出席會議；二、年會應貫徹基督教革新宣言宗旨。¹⁰⁷

年會召開期間，中共中央華東局統一戰線工作部部長潘漢年向全體代表講話，重申基督教與愛國主義問題，同時也指出人民政府將貫徹宗教自由的規定，並處理各地涉及教會與政府或部隊的糾紛。¹⁰⁸

吳耀宗在年會上，作出題爲〈基督教革新運動〉的演講。他指出基督教與帝國主義的關係，是現代基督教最大的「污點」。因此，中國基督教應當割斷同帝國主義的關係，肅清基督教裡面帝國主義的力量與影響。他認爲耶穌基督的福音是救人救世的福音，但今日的基督教並沒有實行這個福音，「它腐化了，他沒有負起改造世界的責任」。當前革命運動所「否定」的，亦是這個腐化了的基督教。只要基督教在上帝面前懺悔，恢復耶穌的福音的本來面目，便可成爲新時代的積極建設的力量。他最後總結時說：

基督教革新運動，是一個革命運動，是整個中國革命運動的一環。把中國基督教

¹⁰⁵ 繆秋笙，〈美帝國主義怎樣通過基督教協進會破壞三自革新運動〉，頁 10。

¹⁰⁶ 江文漢，〈吳耀宗——中國基督教的先知〉，《回憶吳耀宗先生》，頁 54。

¹⁰⁷ 參姚民權、羅偉虹，《中國基督教簡史》（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頁 265 至 266。

姚、羅著作稱周而復爲上海市委統戰部副部長，而周力行為華東宗教事務處處長。有關兩人的職稱有誤。據周而復的回憶，中共上海市委到一九五一年冬或一九五二年春，才成立統戰部。而在此之前，他是華東局統戰部秘書長。參周而復，《往事回首錄之貳：雄雞一聲天下白》（北京：中國工人出版社，2004），頁 26、122。此外，宗教事務處是一九五一年一月後才成立的，故周力行此時也不是以華東宗教事務處處長身分參加。周而復也指出，建國初年，他曾向潘漢年建議在華東局統戰部下成立宗教民族處，潘並不反對，但由於當時統戰部幹部少，無法增設新的處級機構，故只能由秘書處協辦。參周而復，《往事回首錄之貳：雄雞一聲天下白》，頁 50。一九五一年一月，政務院發出〈關於設立宗教問題委員會及宗教事務處的決定〉，指示在各大行政區文教委員會成立相應的宗教事務處，專責統一辦理及研究有關基督教、天主教及佛教的工作，並與這些宗教界人士取得經常聯絡。參赤耐主編，《當代中國的宗教工作》（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8），上冊，頁 242 至 243。

¹⁰⁸ 吳高梓，〈全國基督教協進會第十四屆年會〉，《協進月刊》，第 9 卷 3 期（1950 年 11 月），頁 4。

一百多年來積聚下來的弊病和弱點革掉，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也不是一件在短時間能夠完成的事。現在還有不少的基督徒，對帝國主義的真相，沒看得清楚；對基督教自力更新的計劃，沒有足夠的信念，甚至有人認為基督教可以同政治完全分開；這些都是帝國主義給中國的基督教所遺留下來的壞的影響。我們不應該讓這些影響繼續存在，在新中國的環自中，它也不可能繼續存在。……我們相信整個基督教革新運動，在一個相當期間，必能勝利地完成它的任務。¹⁰⁹

在黨國積極干預下，結果協進會年會從部署反對吳耀宗的宣言，變成全面擁護，並號召全國信徒踴躍參加簽名。至於教會革新方面，年會作了五方面的決議：（一）促進全國各教會及基督教團體，以最大決心，於五年內完成三自運動；（二）發起青年信徒運動，希望在各教會及團體內實現三分一的基督徒青年擔負領袖；（三）約請全國神學院負責人，舉行神學教育協商會議，擬訂今後神學教育方針；（四）請全國同工努力追求了解新知識；（五）號召全國教會根據群眾需要，深入檢討現實工作。¹¹⁰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擁護革新宣言外，年會涉及教會革新的議決並沒有觸及基督教與帝國主義的關係，其中最具體者提及在五年內完成三自運動，基本上是朝著五年自養的目標。其他關於青年信徒及學習新時代知識的決議，似乎更是形式多於一切。這與吳耀宗的革新方向，仍有很大的差距。

在選舉十四屆執委會時，海維德、畢範宇及黃安素（Ralph A. Ward）等傳教士在會外傳達了不欲吳耀宗當選主席的指示，並表示一旦因當選，英美差會的津貼會立即停止。最後吳高梓當選新主席，崔憲祥、吳貽芳、吳耀宗為副會長，反映許多代表仍企圖藉此吸引外來津貼。¹¹¹據報導，在選舉進行時，崔憲祥與江長川的票數極高，兩人特地上台說明自己年老職重，請求眾人選舉德孚眾望而年少力壯的教牧為正副會長。¹¹²無論如何，協進會各代表，對吳耀宗仍有一定的抗拒。對於基督教與帝國主義關係的理解，也不見得是完全接納吳氏的立場。

其實，部分協進會背景的教會領袖，即或擔任了宣言的發起人，但對於基督教與帝國主義的關係，也往往低調地予以淡化。例如，江長川就革新宣言在《天風》發表書面談話時，便沒有在這個問題上表態，而把重點集中於實現自立自養方面，並強調要建立一個「基督化的中國化的教會」。¹¹³而在協進會十四屆年會上，江氏的發言亦只是重申其原來的革新構想而已。¹¹⁴衛理公會的孫彥理指出，江對於帝國主義利用基督教的說法，是有所保留的。¹¹⁵筆者相信，江長川之同意任宣言的發起人，主要原因，在於宣言是基督教在新中國成立後必須作的公開政治表態。正如華中大學校長韋卓民把宣言視作中國基督教鮮明的政治立場，說明中國基督徒與其他中國人民一樣，有共同的立場。¹¹⁶中華信義會書報部謝受靈也強調，這是一篇對外的宣言，目的是要說明「基督徒這新中

¹⁰⁹ 吳耀宗，〈基督教革新運動〉，《協進月刊》，第9卷4期（1950年12月），頁4至7。

¹¹⁰ 吳高梓，〈全國基督教協進會第十四屆年會〉，頁4至5。

¹¹¹ 繆秋笙，〈美帝國主義怎樣通過基督教協進會破壞三自革新運動〉，頁11。

¹¹² 〈協進會新執委產生〉，《協進月刊》，第9卷4期（1950年12月），頁27。

¹¹³ 〈展開教會歷史的新頁——基督徒領袖發表書面談話〉，《天風》，第233至234期（1950年9月），頁5。

¹¹⁴ 江長川，〈教會革新與第十四屆年會〉，《協進》，第9卷第3期（1950年11月），頁6至9。

¹¹⁵ 孫彥理，〈我所認識的江長川會督〉，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上海市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上海文史資料》，第81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頁339。

¹¹⁶ 〈武漢教會領袖熱烈擁護基督教愛國人士最近發表的宣言〉，頁10。

國的建設中應有的政治立場」，而不涉及信仰的問題。¹¹⁷在政治現實下作的政治表態，相信是不少教會人士簽名的關鍵所在。對這些人而言，中國基督教的革新方向與途徑，大抵仍是自立、自養式的變革，而不涉及基督教與帝國主義這種全稱性的關係。

對於協進會這種既合作又抵抗的作法，吳耀宗亦有充分的理解。他在協進會年會期間，於《光明日報》發表了〈怎樣推進基督教的革新運動〉，指基督教革新的目標，仍有一段漫長的路才能實現。首先，如果把革新運動等同是實現自治、自養、自傳的目標，那麼，他認為，國內實際上有「不少教會已完全走上自治及自養的道路」，這個層面的革新對這些教會似乎並不適合。至於其他教會及其事業，以至全國性或區域性的行政機構，仍全部或部分地依靠外國的經濟援助。他相信，有關問題在不會太長的時期內，也可以獲得滿意的解決。

顯然，吳耀宗關心的革新，並不僅是上述自治自養的層次，而是涉及肅清帝國主義在基督教裡面的力量與影響問題。在吳耀宗心目中，不管是否在組織及經濟上實現自治自養，教會仍深受帝國主義的影響。他認為仍有不少同道沒有清楚了解，不承認問題的存在。因此，在教會內部「必須進行一個長期的，反帝國主義、反封建主義、反官僚資本主義的教育」。他針對仍有不少憂慮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會否落實，但他認為，最重要的關鍵，其實是「基督教能否在社會裡發生它所應當發生的作用」。他說：

如果基督教不能發生這些作用，即使在法律上給它一個保障，它自己也是會消滅的。相反地，如果基督教對人民有貢獻，如果基督教能夠隨著時代的推展而進展，基督教就不只能夠存在，並且會被人重視。至於基督教是否可以，或應當，永久保存著它現在的形式，和思想的範疇，那就是一個歷史演變的問題，不但教外的人不能替我們回答，就是我們自己也不能對它做甚麼肯定的預言。¹¹⁸

對吳而言，他從不關心基督教身處的外在處境，而是究竟基督教是否能夠發揮自己在社會應有的作用。對比吳耀宗的觀點與協進會年會的議決，可見，年會充其量只在第一點上符合了吳氏革新的要求，至於如何開展長期的反帝教育，以及肅清帝國主義影響，協進會的革新方向其實仍未達標。

〈怎樣推進基督教的革新運動〉一文，獲得了毛澤東高度評價，《光明日報》刊登後翌日（十月廿一日），毛立即指示時任中央人民政府新聞總署署長的胡喬木，請他安排廣播全文，並交《人民日報》轉載。¹¹⁹十月廿三日，《人民日報》、上海《新聞日報》均全文轉載了這篇文章，反映出黨國對吳耀宗的革新基督教構想的重視與支持。後來，《天風》亦刊載了吳的文章。¹²⁰

簽名運動的開展

由於得到政府公開支持，簽名擁護吳耀宗的教會團體及人士數目也大大增加。到一九五一年四月，已增至二十萬個簽名，甚至連原先反對宣言的倪柝聲，也因應形勢變化，

¹¹⁷ 謝受靈，〈我為甚麼簽名？〉，《信義報》，第4卷19-20期（1950年10月），頁4。

¹¹⁸ 吳耀宗，〈怎樣推進基督教革新運動〉，《光明日報》，1950年10月20日。

¹¹⁹ 〈關於廣播吳耀宗文章給吳喬木的信（1950年10月21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卷，頁581。

¹²⁰ 吳耀宗，〈怎樣推進基督教革新運動〉，《天風》，第237期（1950年10月28日），頁3至4。

帶領全國的基督徒聚會處高調地擁護革新宣言。¹²¹周恩來對簽名運動的期許，特別是用群眾表態的壓力來逼使更多教會領袖參與，起碼在動員人數上取得極大的果效。

筆者據《天風》整理了不同階段關於簽名運動的進展，從【圖表二】可見，從八月底至九月底間，簽名的人數從 1527 人增至 3268 人，增加了 1741 人。由於《人民日報》於九月廿三日始刊登社論支持宣言，故其效應未及反映在第二批的簽名人數上。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基督教宣道會華會主席沙毅及中國耶穌教自立會全國總會理事長陳品潔簽名支持宣言。¹²²不過，自《人民日報》高調支持宣言後，全國各地在十月開始舉行了各種聚會或座談會，擁護三自運動及革新宣言。¹²³因此，簽名人數到十二月初，已增至 26727 人，及至十二月底，更多達 78596 人。¹²⁴一九五一年一月底，革新宣言已有近 9 萬人簽名。¹²⁵一九五一年四月，隨著抗美援朝運動的開展，簽名運動再取得較顯著的進展，人數躍增至 200195 人，信徒的宗派背景也更趨多元。到一九五三年九月，由於三自革新籌委會於五一年四月底成立，推動宣言也成為基督教革新運動的重要工作，故簽名人數再上升至 400222 人。

從【圖表三】可見，截至一九五三年九月底，支持革新宣言的宗派主要是：中華基督教會（18%）、信義會（11%）、基督徒聚會處（9%）、聖公會（6%）、耶穌教自立會（5%）、衛理公會（5%）、循道公會（5%）、真耶穌教會（3%）、內地會（3%）、浸會（2%）。這十個宗派共佔了整體簽名人數的 67%，其中屬於西方差會建立的宗派佔 50%，本土教派與自立教會則有 17%。

再者，【圖表四】說明支持革新宣言的地域分佈並不平衡：浙江（21%）、河南（11%）、福建（9%）、江蘇（7%）、上海（7%）、山東（6%）、湖北（6%）、湖南（4%）、廣東（4%）、安徽（3%）。過半的（55%）簽名人數集中於四省一市，其中以華東地區的比例最高（53%）。¹²⁶

其實，上述宗派或地域的分佈可見，革新宣言的簽名人數雖然多達 40 萬，佔全國近 100 萬信徒約三成多，但實際上三自革新運動仍未能完全整合及團結不同的宗派。首先，簽名人數無疑反映了個別宗派領袖對革新運動的支持，但這種支持只不過是一種形式上的表態而已，並不涉及宗派內部的運作與具體的革新方向。政府方面亦承認，基督教有上層分子在三自運動中「搞假簽名」，「企圖藉三自運動來統一其內部以對抗三自運動」，他們成立基督教聯合會，企圖把各種教會團結在內，「利用一切機會，爭取提高其政治地位，發展其組織，並企圖分化我們內部」。¹²⁷其次，即使這種對外表態的行為，也未能獲得不同宗派的廣泛支持。顯然，那些本土教派或自立教會，比起具西方差會背景的宗派的參與，是更為消極的。甚至有教會人士，如貴陽內地會的張煥菁與巫國驥等，於五〇年十二月發起〈四川省基督徒擁護新中國建設政綱共同宣言〉，提出以聖經觀點來實行三自，不反對帝國主義，並認為「屬靈」的基督徒不應參與吳耀宗等沒有信仰的

¹²¹ 詳參邢福增，《反帝·愛國·屬靈人——倪柝聲與基督徒聚會處研究》（香港：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2005），頁 42 至 48。

¹²² 沙毅的解釋是：「愛護祖國，服從政府，這是聖經上給我們明確的指示；抗拒罪惡，擁護真理，這更是基督給我們偉大的教訓。我既為基督徒，應本聖經之指示與基督之付託，要向『三反』與『三自』繼續努力，故簽名於此」。〈我為甚麼在基督教宣言上簽名？〉，《信義報》，第 4 卷 21 期（1950 年 11 月），頁 14。

¹²³ 參一九五一年十月至十二月間的《人民日報》。

¹²⁴ 吳耀宗，〈基督教革新運動的新階段〉，《人民日報》，1951 年 1 月 15 日。

¹²⁵ 〈革新宣言簽名已近九萬〉，《天風》，第 247 期（1951 年 1 月 20 日），頁 11。

¹²⁶ 按當時《天風》的標準，華東區包括：山東、浙江、福建、江蘇、安徽及上海。

¹²⁷ 〈天津基督教和天主教內部分化，上層分子對抗三自運動〉，《內部參考》，第 11 號（1951 年 1 月 22 日），頁 65。

青年會派的宣言。據悉，宣言在重慶市獲得二千多人簽名。他們甚至聯繫宣新宣言的發起人之一的陳崇桂（時為重慶神學院院長），爭取他支持反吳耀宗。¹²⁸筆者相信，一九五一年四月由中央政府出面召開的北京會議，以及一九五四年召開的全國基督教會議，便是企圖擴大基督教界的團結面，並進一步確立三自組織的領導地位。

四．結論

筆者在上文業已詳細梳理了革新宣言的由來，簽名運動的發展及其背後所反映黨國、吳耀宗及協進會派人士的雜複互動關係。現在嘗試從黨國及吳耀宗這兩個不同的主體，為本文作結。

黨國與宗教革新

第一，革新宣言清楚說明了黨國在解放初期對基督教革新的領導角色。在中共中央於一九五一年三月下發關於宗教革新的文件中，指「去年七月基督教徒發出的革新宣言，是在中央的直接推動下產生的。去年十月在上海舉行的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年會，通過擁護革新宣言的決議，是在華東局的積極領導下產生的」。

這份〈中共中央關於積極推進宗教革新運動的指示〉文件，可說是對當時以基督教為主的革新運動的初步經驗總結，充份突顯了「政府積極出面推動」自治、自養及自傳運動的角色。文件具體指出三方面的工作：第一是不怕麻煩與教會上層中國領導人「談判」；第二是在下層教徒中進行愛國教育，「發動他們逼使上層實行自治、自養、自傳」；第三是對教會各單位（教堂及團體）要切實與中國負責人商量，協助其解決經濟上的自養問題。文件又說：

這些經驗以及其他一切經驗說明：基督教、天主教的任何有效的革新運動，都不可能是教徒的自發運動，而只能在黨和人民政府積極領導督促下發生和發展；並且只要我們採取積極政策，主動地找他們的負責人士來談話，說明政府的政策，消除他們的顧慮，就一定能夠發動他們中間的多數起來實行革新，而一般教徒為了自己的存在和利益，也不能不革新。¹²⁹

文件又要求各大行政區及重要省、市應迅速按照上述的辦法，由文教委員會或文教廳（局）出面，邀集當地天主教及基督教的上層分子及進步分子舉行茶會或座談會，使發動下層的工作與這種上層的推動工作相配合。在會上，應有政府重要負責人員講話，內容包括：（一）指出中國的教會曾被帝國主義利用，但同時說明絕大多數的教徒是善良的，具有愛國心的，以便爭取大多數教徒；（二）熱烈地鼓勵教徒愛國；（三）任何宗教的管理權應歸中國人掌握，不容外國人操縱。某些在中國多年的外國傳教士，確屬善良守法，不涉政治活動者，又不掌教務者，仍可在中國居留；（四）明確指出梵蒂岡已為美帝反動勢力控制，不容許梵蒂岡利用中國天主教破壞新中國，只要梵蒂岡不干涉中國宗教革新運動及在中國不進行政治活動，仍可與中國教徒有純粹宗教性質上的聯繫；（五）教徒要努力實現自養，對於某些有成績的教會公益事業及宗教建築，政府亦樂於幫助維持。文件指出，經過這些茶會或座談後，當地宗教事務處應與教會人士建立經常

¹²⁸ 陳崇桂，〈重慶神學院與三反運動〉，《天風》，第324期（1952年7月26日），頁8另〈廣元、重慶宗教革新運動迄無進展〉，《內部參考》，第65號（1951年4月14日），頁80。

¹²⁹ 〈中共中央關於積極推進宗教革新運動的指示（1951年3月5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2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頁95。

的關係，對他們的自立革新運動給予經常的推動和領導。¹³⁰

一九五一年開始，隨著抗美援朝反帝愛國運動的開展，宗教革新運動進入了新的階段。

先是一九五〇年六月，朝鮮戰爭爆發，東亞形勢驟變。美國於六月底派第七艦隊進駐台灣海峽。九月，美國介入朝鮮戰爭，十月，中國人民志願軍跨過鴨綠江迎戰美軍，中美兩國實際上進入了「戰爭狀態」。¹³¹十二月十六日，美國實施針對中國的經濟禁運，並宣佈凍結中國在美的公私財產。對此，中央人民政府亦於十二月廿八日發佈命令，管制美國在華財產，並凍結美國在華的公私存款。

由於中國宣佈凍結美國在華一切財產，大量接受美國津貼的教育、慈善、文化及宗教組團面對即時的財政危機。中國政府在十二月廿九日召開的政務院六十五次政務會議上，通過了《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關於處理接受美國津貼的文化教育救濟機關及宗教團體的方針的決定》等文件。文件明確指出，有關接受美國援助的機關及團體轉為中國政府接管或國人自辦的原則。專責文教事務的副總理郭沫若在報告中指出，接受美國津貼之中國宗教團體，應使之改變為中國教徒完全自辦的團體，政府對他們的自立自養自傳運動應予以鼓勵。¹³²其實，來自美國的財政援助一旦中斷，則有關機關及團體在客觀上也不得不實行自辦。對中央政府而言，接管肯定構成沉重的財政壓力，因此，政務院批准有關機關及團體仍可動用在銀行的存款。¹³³雖然美國津貼將停止匯至中國，但已有的津貼款項仍可使用。這無疑舒緩了政府接管及國人自辦時面對的財政壓力。

筆者相信，接管及自辦的財政問題倒仍次要，中國政府更關注的是，如何藉此機會肅清美帝國主義對中國「文化侵略」的遺毒。郭沫若的報告，最大的篇幅其實是從文化層面來討論美帝國主義對中國侵略，這種「文化侵略」表現為：

以巨額款項津貼宗教、教育、文化、醫療、出版、救濟等各項事業，加以控制，來進行對中國人民的欺騙、麻醉、和灌輸奴化思想，以圖從精神上來奴役中國人民。

解放後，美帝國主義仍「不斷地企圖利用這些機關和團體暗中進行其反動的宣傳和活動」。政府必須肅清美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影響，「把一百餘年來美帝國主義對中國人民的文化侵略，最後地、徹底地、永遠地、全部地加以結束」。¹³⁴周恩來在政務會議的報告亦指出：「過去我們曾設想，要把美帝國主義的殘餘勢力從中國完全肅清，還需要三四年的時間，但最近美國宣佈凍結我國在其境內的財產，這給了我們一個很有利的機會，我們可以提早把美帝國主義在我國的殘餘勢力肅清出去。現在，我們宣佈這一命令，對美帝國主義是一個嚴重打擊」。¹³⁵

¹³⁰ 〈中共中央關於積極推進宗教革新運動的指示〉，頁 96 至 97。

¹³¹ 參林利民，《遏制中國——朝鮮戰爭與中美關係》（北京：時事出版社，2000），第 3 章。

¹³² 郭沫若，〈關於處理接受美國津貼的文化教育救濟機關及宗教團體的方針的報告（1950 年 12 月 29 日）〉，《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 1 冊，頁 511 至 515。

¹³³ 在五一年一月十二日的政務會議上，周恩來對凍結美國在華的公私存款命令予以進一步的解釋，強調這是「指美國的財產、美國人的經濟企業和美人的存款，其他接受美國津貼的學校、教會、醫院等不應視為美國所有，因此它們的存款不應凍結，仍准動用」。《周恩來年譜（1949-1976）》，1951 年 1 月 12 日，上卷，頁 116 至 117。

¹³⁴ 郭沫若，〈關於處理接受美國津貼的文化教育救濟機關及宗教團體的方針的報告〉，頁 511 至 515。

¹³⁵ 《周恩來年譜（1949-1976）》，1950 年 12 月 29 日，上卷，頁 109 至 110。

一九五一年一月十六至廿五日，第二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重點討論了抗美援朝運動的形勢與統一戰線工作的關係。胡喬木在會議上指出，抗美援朝運動在中國引起了一個「反帝高潮」，對各方面的工作也起了極大的推動作用。在提及要把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各種影響「連根鏟除」時，胡氏特別把矛頭指向天主教及基督教。他認為教會內反動分子只佔少數，絕大多數是可以爭取的，重要的辦法是同他們的領袖人物公開談判。「對他們說：他擁護政府，政府就保護你，中央人民政府決定在各地成立宗教事務處，進行對教會的公開管理」。¹³⁶胡氏所指的「擁護政府」，具體地就是擁護吳耀宗領導的革新運動，並肅清美帝在教會內的勢力。

這次全國統戰會議明確了在天主教及基督教中開展反帝愛國的鬥爭。中共中央宣傳部長陸定一就如何在反帝愛國運動中爭取教徒問題作了重要講話。他指出黨國現時所要求的中心目的，就是要使教會「在政治上、組織上脫離帝國主義的關係」，但在過程中卻必須要把廣大教徒從帝國主義影響下爭取過來，實現改造教會。¹³⁷

筆者相信，中央成功介入協進會十四屆年會只是象徵式的勝利，對於如何進一步實現基督教革新，特別是在多元宗派林立的局面中推動革新，顯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中央起初的部署，大抵是循兩個方向來推動革新。

第一是模式是要求各宗派從速召開其全國性的會議，具體落實關於三自革新的方向。

先是一九五〇年一月廿二日，中華基督教會全國總會常務委員會召開了緊急會議，議決擁護政務院的決定，不再接受任何外國津貼。¹³⁸不過，中華基督教會的決議，基本上仍是協進會模式的革新，僅僅處理了自養的問題，沒有觸及思想層面的革新。（由於美國津貼及援助已停止，故實際上中華基督教會總會的自養只是對既成事實的陳述而已）在這方面，中華信義會的全國會議，便更具突破性及劃時代的意義。

中華信義會是協進會年會後，首個召開全國性會議的宗派。這次會議以信義會總務部擴大會議的名義召開，於一月廿五至廿九日假漢口舉行。擴大會議的代表，包括十二個總會的正式代表（尚有四個宗會代表因故沒有出席），廿九名特約代表及十一位列席代表。特約代表的人數超過了正式代表的人數，反映出原有的總務部的領導權業已被架空。《信義報》在報導時，清楚指出，會議是「在政府的大力協助之下」舉行的。我們可見，中南局統戰部、宣傳部及武漢市委宣傳部的代表都在會中發表講話。大會除了跟十六個外國信義宗的差會割斷關係，並更名爲中國基督教信義會外，更重要的，是加入了控訴外國傳教士及已出國的信義會領導彭福罪行的環節，並且發表宣言及致全國同道書，表明信義會對革新的訴求。¹³⁹

中華信義會這次擴大會議，是在中南局的指導下，按著黨國對基督教革新的部署來進行的。值得注意的是，這是新中國成立後教會層面的首次控訴，而這種以控訴的方式來進行反帝鬥爭的手法，顯然也是在黨國的要求下進行的。

¹³⁶ 中共中央統戰部研究室編，《歷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概況和文獻》，頁 39 至 40。

¹³⁷ 陸定一，〈爭取團結廣大群眾，肅清帝國主義在中國的文化侵略的影響〉，頁 45 至 49。

¹³⁸ 〈中華基督教會全國總會站起來了〉，《中華基督教會全國總會公報》，第 23 卷 2 期（1951 年 2 月），頁 1。另蔡志澄，〈中華基督教會全國總會以具體行動響應自養號召〉，《天風》，第 249 至 250 期（1951 年 2 月 3 日），頁 6 至 7。

¹³⁹ 有關信義會是次會議的各項報導及記錄，參《信義報》，的「會議專號」，復刊第 5 卷 1 期（1951 年 4 月），頁 1 至 15。

黨國第二個推動革新的模式是以地區為核心，另起爐灶，籌組革新組織來推動革新。一九五一年一月廿八日廣州成立「廣州教會團體學校醫院反美愛國促進三自臨時工作委員會」，便是這種模式的體現。¹⁴⁰《天風》特別發表社論，號召各地學習廣州的經驗，更進一步掀起全國革新運動的浪潮。¹⁴¹

筆者相信，以宗派為主的革新模式固然有效，但缺點是，中央要逐一跟不同的宗派交涉，與每個宗派的上層領導談判。面對基督新教宗派林立的局面，這種革新難免要用上一段頗長的時間。至於以地方中心另組革新組織，往往取決於當地是否有積極擁護革新，並且具一定教會地位的人物支持，抑且在某些宗派全國組織仍未表態革新時，要動員地方宗派組織及教會支持，也面對一定的困難。

我們清楚看見，中共利用了抗美援朝的新形勢，改變了介入的手法，以期能加速革新基督教的步伐。一九五一年三月十五至十九日，第一屆全國宗教工作會議在京召開，進一步確定了天主教及基督教革新運動的方向。¹⁴²會議前，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積極推進宗教革新運動的指示〉，把基督教及天主教的革新運動定性為反帝政治鬥爭的一個重要部分，主要目的是肅清帝國主義對中國文化侵略的影響。同時，中央亦決定由政務院文教委員會出面，於四月間召開全國基督教會議，討論進一步實現三自運動的問題。¹⁴³

四月十六至廿一日，政務院文教委員會在北京召開「處理接受美國津貼的基督教團體會議」，全國一百五十多位基督教代表參加。會議以美國津貼暫停的善後問題為名義召開，為中央政府主導會議提供了合理的根據。事實上，政府廣泛邀請全國不同的宗派出席，即使沒有接受外國津貼的自立教會也不例外，反映政府企圖藉此會議，向全國不同宗派及團體，明確表示黨國對革新的要求。會議有兩個重要的成果，第一是開展了全面及廣泛的控訴運動，目的是肅清中國教會的帝國主義毒素與影響，第二是成立了「中國基督教抗美援朝三自革新運動委員會籌備委員會」。前者確立了基督教革新的方式與目標，後者建立了推動基督教革新的組織。三自革新籌委會成為在各地向不同宗派組織推動革新工作的主要機關。

順帶一提，基督教革新的經驗，也成為黨國針對天主教的重要參照。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卅日，在川北地委積極推動下，四川省廣元縣天主教神父王良佐其其他三位教友召集了五百多名信徒集會，一致通過了〈自立革新宣言〉，提出與帝國主義割斷各方面的關係，肅清親美、恐美、媚美思想。¹⁴⁴十二月廿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中國基督教、天主教人士的愛國運動〉的署名文章，高度評價吳耀宗及王良佐的革新宣言。一九五一年一月八日，《人民日報》再發表題為〈歡迎天主教人士的愛國運動〉的社論，正式肯定在天主教內開展的革新運動，並呼籲更多地區響應革新，使天主教的革新能與基督教並駕齊驅。¹⁴⁵一月十七日，政務院文教委員會邀請華北地區天主教人士舉行茶話會，周恩來亦發表講話。¹⁴⁶筆者在此不擬詳細探討天主教的革新運動，但我們清楚看到，整個天主教的革新手法，都是沿用基督教方面的經驗的。

¹⁴⁰ 〈廣州教會團體學校醫院反美愛國三自運動蓬勃展開〉，《天風》，第 252 期（1951 年 2 月 24 日），頁 2 至 3。

¹⁴¹ 〈學習廣州同道的工作經驗〉，《天風》，第 252 期（1951 年 2 月 24 日），頁 1。

¹⁴² 赤耐主編，《當代中國的宗教工作》（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8），上冊，頁 98 至 99。

¹⁴³ 〈中共中央關於積極推進宗教革新運動的指示〉，頁 94。

¹⁴⁴ 中國天主教愛國會、中國天主教主教團編，《中國天主教獨立自主自辦教會教育教材》（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頁 105 至 107。另〈中共中央關於積極推進宗教革新運動的指示〉，頁 95。

¹⁴⁵ 〈歡迎天主教人士的愛國運動〉，《人民日報》，1951 年 1 月 8 日。

¹⁴⁶ 〈中央文教委員會邀華北區天主教人士茶會，交換天主教革新運動意見〉，《人民日報》，1951 年 1 月 21 日。

不過，黨國在天主教方面推動三自革新面對的阻力甚大，因為天主教的教制與基督教不同，領導高度集中，制度非常嚴密，政府方面亦承認要發動天主教上層革新較為困難。¹⁴⁷筆者在《內部參考》內，便看到不少關於各地天主教有組織地抵抗三自革新的報導，反映了中央對此問題的關注。例如中南區雖然個別大中城市及一些小城鎮已開展一些革新工作，但基本上是「未動起來」，因為「上層不願動」。武漢的簽名運動就因神父不支持而停頓了。「因此只靠下層動，小城鎮動，沒有上層人物的號召、響應，運動的開展是較困難的」。¹⁴⁸抑有進者，甚至廣為政府宣傳的廣元王良佐神父，後來在成都主教要革免其神職的壓力下，也承認是在政府的壓力下提出革新，完全為了應付政府，從未考慮如何進行徹底的革新。故廣元的革新運動不得不停頓下來，其他各地已簽名的地方也出現類似的情況。¹⁴⁹面對天主教會這種組織性的反三自，天主教的革新工作顯然落後於基督教，原來中央計劃於一九五一年下半年召開的全國天主教會會議，結果要延至一九五七年才能召開，在在反映出中國天主教會反革新實力之頑強。政府方面，企圖強化基督教的工作，藉基督教三自運動來影響天主教的下層信徒群眾，進一步促成天主教的三自革新。¹⁵⁰

吳耀宗與基督教革新

其次，筆者嘗試探討一下吳耀宗在基督教革新運動中的角色。

毋庸置疑，吳耀宗是黨國眼中的進步人士，並且與中共處理宗教問題的周恩來關係密切。從上文可見，儘管黨國基本上主導了宗教革新運動的發展藍圖，但我們也不能忽視吳耀宗的角色。解放前後，吳耀宗一直擔任天風社的社長，《天風》因而成為當時鼓吹教會革新的重要輿論陣地。同時，他又是青年會全國總會出版社主任，毋庸置疑，青年會（包括女青年會）在革新運動中，也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曾擔任《天風》主編，並於一九五〇年間積極協助吳耀宗的鄭建業認為，周恩來對吳耀宗的幫助，「並不是全憑外鑠」，在某些革新的根本思想上，吳耀宗「是早已有之的」。¹⁵¹鄭氏的觀察可說切中問題的核心。

吳耀宗本人早於跟周恩來面見時，已認為基督教在解放後面對的主要困難，責任並不在政府，而是教會。早於一九四九年七月，他在一篇題為〈基督教的改造〉的文章中，首先便從兩方面來指陳帝國主義利用基督教的事實：（一）差會與傳教士在主觀意念中，沒有帝國主義的企圖，他們到中國來，是出於完全純潔的動機。但是，他們所屬的國家，卻是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國家。因此，「他們所傳到中國來的基督教，當然也逃不出這種社會制度的影響」，受到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影響。這種情況，尤其是在內戰時期差會及傳教士對共產革命的立場中充分反映出來。由於中國教會在人才、經濟上仰賴西方差會，也無可避免地受到影響與控制。（二）中國基督教的福音，不僅不是耶穌解放人類的「革命福音」，並且「違反了、出賣了這個福音」。這是一個麻醉的個人得救的福音，完全與勞苦大眾脫節。「它不能給痛苦的人類指示一條出路；即使它辦了一些服務慈善的工作，那也不過是頭痛醫頭的改良主義的辦法，對於世界的變革，沒有多少幫助」。基督教因而成為「時代的渣滓，被人唾棄」。

¹⁴⁷ 〈抗美援朝〉，《內部參考》，第 23 號（1951 年 2 月 14 日），頁 70 至 71。

¹⁴⁸ 〈中南區二月份情況概要〉，《內部參考》，第 36 號（1951 年 3 月 3 日），頁 21 至 22。

¹⁴⁹ 〈廣元、重慶宗教革新運動迄無進展〉，頁 79。

¹⁵⁰ 〈上海市抗美援朝愛國運動情況〉，《內部參考》，第 44 號（1951 年 3 月 17 日），頁 79。

¹⁵¹ 鄭建業，〈我敬愛吳耀宗先生〉，頁 134。

所以，基督教必須接受改造。首先，基督教要把自己從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系統中掙扎出來，擺脫出來。基督教不能再「寄生在資產階級裡面」。其次，中國教會要實現它早已提倡的自立、自養、自傳的原則，變成地道的中國教會。這些努力，都代表基督教要在經濟上、物質上、事業上全部或局部的「死亡」，而這個死亡也正是它的新生。此外，基督教要認識現在的時代，及自己的過去。基督教的過去有光明的一面，也有黑暗的一面。「它的迷信，它的腐敗，它的勢利，它的殘暴，它同統治者的勾結」，都要求基督教作嚴厲的自我批評。現在已是人民解放的時代，基督教必須「除舊佈新」：

基督教必須知道，它已經不是醫治世界痛苦的萬靈藥的專賣者，相反地，上帝已經把人類得救的鑰匙，從它手中奪去，給了別人。總一句話說，基督教必須大徹大悟，讓舊的軀殼死去，讓新的生命來臨。¹⁵²

他在人民政協會議的發言，便強調「要用盡我們的力量，把宗教裡面腐惡的傳統和它過去與封建力量、帝國主義者的聯繫，根本剷除」。¹⁵³後來他出席上海基督教團體歡迎人民協政基督徒代表時，向眾人報告時也不諱言他的見解：

有人要問，在各地的教會及青年會等，有好些地方都發生困難，單就華北五省就有一百多件教會案子，那麼全國照此比例來推測，定有一二千件的案件了，則似乎沒有「宗教自由」了，此後也不會有自由了吧。經我調查的結果，有一部份是由於地方當局的誤會所造成的偏向，但極大部分是教會本身的錯誤，這是因為教會與舊勢力有著太過於密切聯繫的關係，並且當地的基督教會以往沒有很好的服務表現，不能與人民打成一片，此乃自食其果。如果基督教真正為人民服務，則人民會起來幫助我們，為替我們基督教會解釋。否則，即使政府來調解，也是沒有好結果的。這件事的責任在乎我們自己。¹⁵⁴

五〇年一月他在協進會擴大委執會上作關於「基督教與新時代」的演講，總結基督教訪問團在華東、華中各地的訪問時，已指出基督教目前所遇到的困難，「大部分要由我們自己負責」。他特別把反對帝國主義視作新時代下基督教應作的事。「美帝國主義給中國造成了許多的孽」，它強迫中國人接受其思想與擺佈。他特別強調，「我們所反對的是美國的帝國主義政策，不是反對美國的基督徒及西差會。中美的傳統友誼，是中美人民的友誼，我們是贊成的」。不過，卻要小心個別差會或傳教士反對共產主義的立場。¹⁵⁵

可以說，吳耀宗與中共均認同基督教與帝國主義間，有著密切的關係，也就是在這個共同的基礎上，促成了基督教革新運動的開展。關於中共與吳之間是否仍有分歧的問題，過去我們受到周恩來於五月二十日對宣言第五稿的評語影響——特別是指宣言把基督教與帝國主義的關係說得偶然，認為吳與中共間有一定的分歧。不過，我們必須留意，宣言的內容並不完全是吳耀宗個人的觀點，整個宣言的撰寫過程，其實充份反映出他與中共及其他宗派領袖間的持續角力。吳耀宗為了爭取更多教會領袖的支持，所以他必須把帝國主義與基督教的關係，用偶然的方式來表述。後來周恩來也同意宣言是各方面所

¹⁵² 吳耀宗，〈基督教的改造〉，《天風》，第 173 期（1949 年 7 月 30 日），頁 8 至 9。

¹⁵³ 吳耀宗，〈對於人民政協會議三大文件的擁護——人民政協會議宗教界民主人士首席代表吳耀宗發言〉，氏著，《黑暗與光明》（上海：青年協會，1949），頁 276。

¹⁵⁴ 何慈洪記，〈人民協政基督徒代表的話——上海「歡迎人民協政基督徒代表」晚會追記之二〉，《天風》，第 192 期（1949 年 12 月 10 日），頁 9。

¹⁵⁵ 何慈洪筆記，〈基督教與新時代〉，《基督教叢刊》，第 24 期（1950 年 3 月），頁 68 至 69。

尋求的最大共識：「如果由我起草一個宣言拿出來，他們也會同意。可是這樣做就沒有作用了」。「只要和國家政策接近，只要大的方向對了，就不要去改他們的，差一點更好，完全和我們說的一樣倒不好。不能要求十全十美。……只要大的方面有了共同性，小的方面存在差別是允許的」。¹⁵⁶毋庸置疑，周氏所強調的國家政策的大方向，就是把肅清基督教與帝國主義的關係，作為基督教革新的起點與方向。就這點而言，周吳二人是一致的。

筆者相信，吳耀宗與中共之間的主要分歧，並不體現於組織性、人事性與結構性、思想性的對立，¹⁵⁷因為中共對基督教與「文化侵略」的關係，顯然已涉及思想及意識形態的層面，與吳有不少共通之處。吳耀宗與中共最大的不同，在於他仍相信耶穌基督的革命精神，乃解放人類的革命福音，只是現實的基督教業已腐敗，無法體現耶穌的革命精神而已。而他對中共的接納，是因為中共已經把上帝的真理實踐出來。他之所以完全傾向擁護中共及共產主義，其實在懷有強烈的改造基督教的動機。

吳耀宗理解到教會領袖對基督教完全擁護中共及共產主義的傾向，會否失去了自己的立場。他的回答是：「基督教是有自己的立場的，但基督教對新時代中一切與它教義不違反的趨勢都可以採取一個贊成和合作的態度」。他重申基督教的獨殊貢獻是「耶穌基督的福音裡面關於人與人，人與上帝、以及其他一切做人的道理」。不過，他卻指出兩個事實：第一，「基督教以外的人，也未嘗沒有這些道理」，他們是憑著經驗，一點一點學習來的。第二，基督教的永恆真理，「沒有被現在有組織的基督教表現出來」，所以現時基督教被人反對，被人輕視。因此，基督教要努力把耶穌所顯示的真理表彰出來，「同現在時代的主要潮流綜合起來，成爲一個辯證的發展」。這樣，基督教便會被人瞭解，被人接受。¹⁵⁸

吳耀宗相信，教會業已跟真理背道而馳，而他卻在實踐過程中發現了上帝的真理，業已在社會主義革命事業中彰顯出來。他認為只要是上帝的真理，「無論在甚麼地方顯現，我們都應當服從」，「表面上的信與不信，不能作為標準」。只要是上帝的啓示，他都願意服從。他承認這種對真理與教會關係的理解，跟「正統派」同道常發生矛盾，甚至被指為「出賣了基督教」，特別在革新宣言發出後，他受到了許多的批評，聽到了不少的謠言，令他承受極大的壓力。但他深信：

鬥爭是痛苦的；鬥爭當時好像是脫離群眾，可是這並不一定是錯的。耶穌從一開始就有人反對他，本鄉的人也不容他，最後連門徒也離棄了他，使他孤獨地走上十字架。我們在鬥爭的痛苦中，看了十字架，就可以得到很多的安慰。

……我的經驗告訴我：不顧一切，服務上帝的旨意，是可以得到平安的。在晚上，當我躺在床上，對著上帝，省察自己，我覺得問心無愧，非常平安。在這些時候，如果我發覺錯誤，就勇敢地糾正自己。無論怎樣，我知道上帝是我的可靠的領導者。

卅年來，宗教信仰控制著我。有時上帝領導我到不願去的地方去。當時我想擺脫

¹⁵⁶ 周恩來，〈在中共中央統戰部舉行的茶話會上的講話〉（1951年1月20日），中共中央統戰部研究室編，《歷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概況和文獻》（北京：檔案出版社，1988），頁54。

¹⁵⁷ 梁家麟，〈中共建國前後吳耀宗的教會改造思想〉，頁45。

¹⁵⁸ 何慈洪筆記，〈基督教與新時代〉，頁68至69。

一切，到偏僻的地方，過安靜的生活，然而我不能這樣的逃避，因為上帝的聲音在呼召我，我只有不自由地跟著這聲音走。¹⁵⁹

一九五一年一月廿八日，吳也把自己面對壓力的心境記在日記上：「日來心境較安舒，一切均聽上帝安排，自己不再作主，不再將許多重擔壓在身上。成敗得失，是非毀譽，不再縈懷。一切欲求均交託上帝，或得成全，或不成全，均聽他決定。個人之生活、安逸亦不再為之憂慮。耶穌說：『我的軛是容易的，我的擔子是輕省的』，『你們心裡就必得享安息』（太十一：29-30），就是這個意思」。¹⁶⁰

可見，吳耀宗把自己對革新基督教的主張，以及與新政府間的合作，視為上帝的真理及啓示的領導；是上帝揀選他在這個特殊的時代中去改革中國基督教，讓基督福音與革命運動辯證地結合。為了順服上帝的旨意，即使受到其他教會人士的批評與攻擊，他也義不容辭。

吳耀宗對基督教革新的方向與訴求是明確的，但對於革新的內容，特別是如何肅清帝國主義對中國教會的影響，他卻沒有具體的計劃。一九五一年一月，他在青年會全國協商會議時，提出了「青年會應該作全國基督教的領導者」的構想。他認為，在中國基督教需要基本改革的大前提下，只有青年會「與社會有接觸」，「站在時代前線」，最能勝任改革的工作。¹⁶¹吳耀宗對青年會在革新運動的角色是可以理解的，一方面，儘管他已當選為全國協進會的副主席，但協進會仍不是他可以完全架馭的機構。另一方面，他在青年會全國協會工作長達三十年，跟青年會關係密切。雖然他只是出版部的主任，但青年會系統卻極為支持他及新政權。

中共領導人對青年會也有較高的評價，特別是認同青年會對革命工作所產生的作用。例如周恩來肯定解放前青年會「同情中國革命」的表現，青年會內的「進步民主人士」，也曾「掩護過一些從事職工運動的革命分子和共產黨員」。¹⁶²後來（一九五三年）出任華東及上海宗教事務處處長的羅竹風，也說：

因為比起其他宗教團體和教會來，青年會是更加接近中國社會的，當年曾經辦過各式各樣的學習班，魯迅也借青年會舉辦過木刻展覽會。在中國革命遭難的那些年代，青年會有不少人支持與投入民主救亡運動，因此，他們是更富有現實感的，所以能夠站得高些，看得遠些。不像那些迷迷糊糊的集群，出於宗教偏見，往往停滯在極其狹隘的圈子裡，終日朦朦朧朧，正如「坐井觀天」，所見甚小。¹⁶³

我們可以這樣理解羅氏的話：（一）青年會在國家救亡運動中的積極表現，造就了吳耀宗等「進步」人士，他們在關懷救國的過程中，思想愈來愈左傾，成為黨國可以信賴的「同路人」；（二）在愛國統一戰線的脈絡下，青年會亦是中共極易滲透在內的群眾團體，不論在抗日戰爭，以至國共內戰，青年會對於中共擴大團結，打擊對手，以爭取民心方面，均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羅竹風亦承認青年會「掩護過許多共產黨員、進

¹⁵⁹ 李儲文記，〈青年會的宗教基礎——吳耀宗同工講〉，《同工》，新5卷1、2期（1951年2月），頁11。這篇講稿原是他預備於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一日在其服務青年會三十週年紀念日的分享而設的，後來當日臨時有事而沒有領會，後改於一九五一年一月於青年會全國協商會議時主講。

¹⁶⁰ 轉引自沈德溶，《吳耀宗小傳》，頁59。

¹⁶¹ 李儲文記，〈青年會的宗教基礎——吳耀宗同工講〉，頁10。

¹⁶² 〈關於基督教問題的四次談話〉，頁221。

¹⁶³ 羅竹風，〈緬懷吳耀宗先生，堅持「三自愛國」道路〉，頁206至207。

步人士」。¹⁶⁴

不過，這個由青年會來領導基督教改革的構想，在後來卻出現了變數。一九五一年四月，在北京召開的「處理接受美國津貼的基督教團體會議」期間，正式成立了「中國基督教抗美援朝三自革新運動委員會籌委會」，以籌組成立領導統一性全國基督教革新的機構。換言之，原來由青年會來領導中國教會革新的構想，後來變由籌組一個全新的全國性機構取代。

據上海市委統戰部副部長周而復憶述，吳耀宗曾主動到統戰部聯絡他，建議成立基督教的三自機構，號召建立三自的教會。周原則上同意吳的建議，並表示經中央統戰部研究後再作答覆。於是周向潘漢年（中共中央華東局統一戰線工作部部長）匯報，獲得其肯定。而陳毅（華東軍區司令員兼上海市市長）亦十分贊成此事。於是周而復正式答覆吳耀宗，表示中央的支持。¹⁶⁵

吳耀宗在是次會議總結三自革新運動時，指出運動仍有不足之處，例如推動簽名運動方面，約十八萬個簽名，只佔全國基督徒的 18%。同時，即或已經簽名，也不代表其有深入的學習及政治覺悟。其中的關鍵，在於缺乏全國統一領導的機構來推動三自運動，變成許多教會提倡三自運動，卻沒有具體的計劃。因此，有必要成立一個領導全國基督徒推動三自革新愛國運動的機構。¹⁶⁶

吳耀宗需要一個機構來推動三自革新，否則革新只會變成口號。那麼，為何他會改變原來由青年會來統籌三自革新的構想呢？筆者相信，主要原因是他擔心青年會與教會間的關係並不密切，會成為革新運動的阻力。他嘗試：「教會裡的人，常常說我們的宗教修養膚淺」。¹⁶⁷以一個非教會性的基督教機構來領導教會革新，難免會引起教會人士的抗拒。為了爭取更多教會人士的支持，增加革新機構的代表性，他不能不顧慮到教會人士的感受。此外，在抗美援朝反帝愛國的政治洪流下，青年會也因其美國背景，需要進行三自革新，故由青年會來領導革新運動，從政治背景的來看也不恰當。¹⁶⁸職是之故，吳耀宗決定向中共建議，籌組一個新的全國性領導機構。

得指出，這個新的三自革新籌委會，在人事上仍跟青年會有密切的關係。¹⁶⁹籌委會有委員廿五人，其中常務籌委十一人。名單如下（人名下有底線者為常務籌委，人名黑體為革新宣言發起人）：

主席	<u>吳耀宗</u> （全國協會出版組主任）
副主席	<u>涂羽翹</u> （青年會全國協會總幹事）、 <u>陳見真</u> （中華聖公會主教院主席主教）、 <u>陳崇桂</u> （重慶神學院院長）、 <u>鄧裕志</u> （女青年會全國協會總幹事）

¹⁶⁴ 汪維藩，〈丹楓一葉——懷念羅竹風同志〉，上海社會科學會聯合會編，《羅竹風紀念文集》（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7），頁 161。

¹⁶⁵ 周而復，〈往事回首錄之貳：雄雞一聲天下白〉，頁 50。周氏在這裡所指的是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但筆者相信他是把一九五四年成立的三自組織跟一九五一年成立的三自籌委會混淆了。

¹⁶⁶ 吳耀宗，〈八個月來基督教三自革新運動的總結〉，《天風》，262 至 263 期（1951 年 5 月 8 日），頁 5、16。

¹⁶⁷ 李儲文記，〈青年會的宗教基礎——吳耀宗同工講〉，頁 10。

¹⁶⁸ 吳耀宗，〈控訴美帝國主義在青年會內利用改良主義侵略中國〉，《天風》，第 276 號（1951 年 8 月 11 日），頁 8。

¹⁶⁹ 徐以驊指出，各地青年會的學生幹事，後來亦在地方三自組織中扮演重要角色。參 Yihua Xu, “‘Patriotic’ Protestants: The Making of an Official Church,” in *God and Caesar in China: Policy Implications of Church-State Tensions*, eds. Jason Kindopp & Carol Lee Hamrin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4), pp.111-112.

委員	王梓仲 （華北基督教聯合會總幹事）、 吳貽芳 （金陵女子文理學院院長）、 李壽葆 （全國青年會駐京聯絡員）、 李儲文 （青年會全國協會宗教教育部幹事）、 沈德溶 （《天風》主編）、 邵鏡三 （南京中華基督會總幹事）、 喻筠 （中國基督教信義會全國總會主席）、 施如璋 （全國女青年會城市部主任幹事）、 陸志韋 （燕京大學校長）、 敬奠瀛 （耶穌家庭）、 崔憲詳 （中華基督教會全國總會總幹事）、 趙復三 （北京基督教協會會總幹事）、 趙紫宸 （燕京大學宗教學院院長）、 鄭建業 （中華聖公會河南教區總幹事）、 熊真沛 （循道公會華南教區主席）、 劉良模 （全國協會事工組主任）、 謝永欽 （中國耶穌教自立會代理理事長）、 韓文藻 （南京基督教協進會總幹事）、 蕭國貴 （循道公會湖北教區主席）、 羅冠宗 （上海青年會幹事）
----	-----------------------------------------------------------------------------------------------------------------------------------------------------------------------------------------------------------------------------------------------------------------------------------------------------------------------------------------------------------------------------------------------------------------------------------------------------------------------------------------------------------------------

從上述名單可見，廿五人中，具青年會背景者（人名為斜體）佔了十一人（其中趙復三及韓文藻，同時為北京及南京青年會幹事。而沈德溶曾在上海青年會工作。鄭建業屬聖公會背景，但他在按牧前亦曾在上海青年會工作，任學生幹事及德育幹事）。宗派方面，則包括了聖公會、中華基督教會、循道公會、信義會、中華基督會、中國耶穌教自立會、耶穌家庭，其餘為神學院院長及基督教大學校長。

籌委會於一九五一年四月廿五日召開第一次會議，議決在常務委員會下設三個工作機關：聯絡組（組長鄭建業，副組長羅冠宗、李壽葆、施如璋）、宣傳組（組長劉良模，副組長沈德溶（兼《天風》主編）及總務組（組長涂羽卿，副組長陸琪臣〔全國青年會市會組主任〕）。¹⁷⁰上述七人均具青年會背景，加上籌委會主席吳耀宗在內，全國三自籌委的骨幹成員盡由青年會派擔任。同時，籌委會又議決以《天風》作為機關刊物。¹⁷¹一九五二年三自革新籌委正式成立辦公室，由沈德溶任辦公室主任，曾浣凌為副主任，集中處理會務，三個工作組即行撤消。¹⁷²

可以說，三自革新籌委會基本上是以青年會派及天風派人士為主要核心。由於三自籌委與青年會間的密切關係，故原先吳耀宗憂慮青年會與教會間的距離，對三自運動的發展，仍然有一定的負面影響。我們清楚可見，三自運動的發展，首先是獲得具西方差會背景的主流宗派支持，對於基要派或屬靈派的教會而言，他們抵制三自運動的主要原因，除了以自身與西方差會無關，早已實現三自外，就是批評三自是「被青年會派所把持，吳耀宗他們是『異端』，本來就是沒有信仰的」。而三自革新就是要碰「屬靈派」的信仰。¹⁷³

三自籌委會成立後，首要的工作就是在各地推動不同宗派教會及基督教團體開展控訴及學習運動，實現肅清帝國主義對中國教會在各方面的影響。基本上，在黨國的支持下，吳耀宗正式成為基督教革新運動的領導者。不過，革新運動仍面對不同宗派機構在不同程度上的抵制甚至反對，如何在急風暴雨的政治環境下實現其改造基督教的構想，以及他往後所扮演的角色，便得在另文再作探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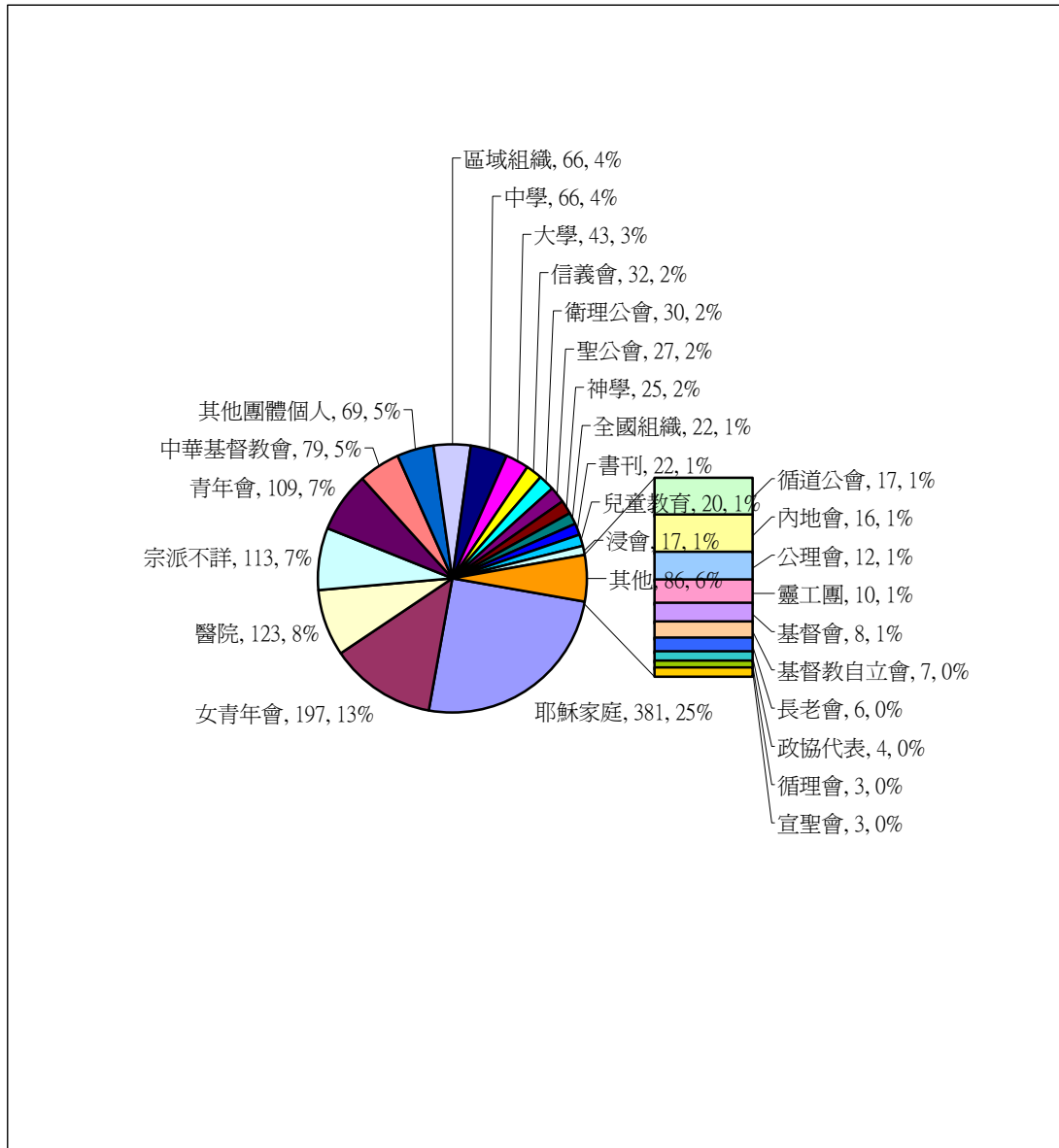
¹⁷⁰ 沈德溶，〈記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的誕生〉，氏著，《在三自工作五十年》，頁 24。另〈中國基督教抗美援朝三自革新運動委員會第一次會議記錄〉，《天風》，第 262 至 263 期（1951 年 5 月 8 日），頁 31。

¹⁷¹ 〈中國基督教抗美援朝三自革新運動委員會第一次會議記錄〉，頁 31。

¹⁷² 沈德溶，〈記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的誕生〉，頁 24。

¹⁷³ 羅竹風，〈緬懷吳耀宗先生，堅持「三自愛國」道路〉，《回憶吳耀宗先生》，頁 201 至 202。

圖表一：革新宣言簽名人背景 1950年8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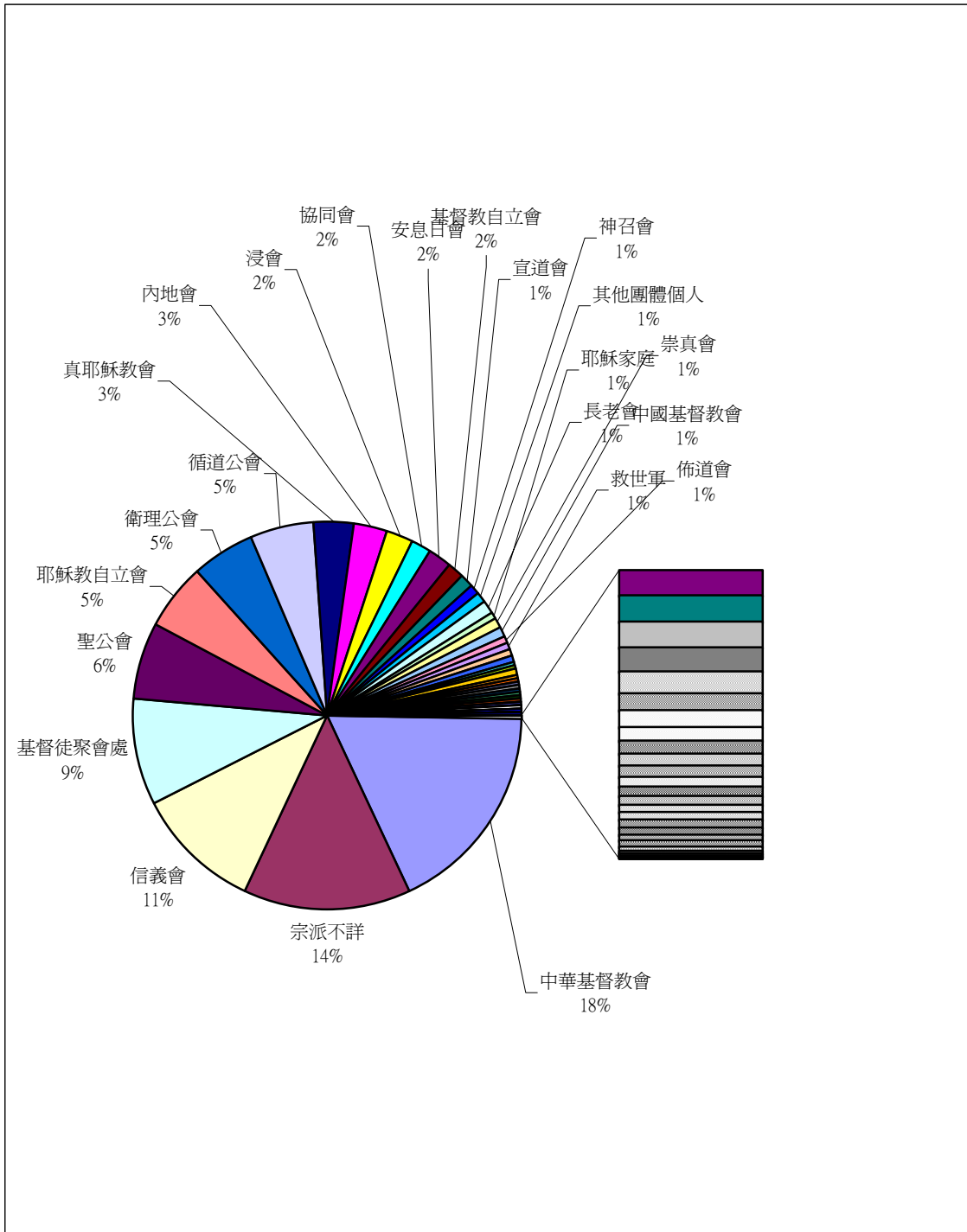
圖表二：革新宣言簽名人比較

	1950.8	1950.9	1951.4	1953.9
政協代表	4	4	4	4
全國組織	22	26	167	168
區域組織	66	98	467	468
中華基督教會	79	327	39849	71478
基督教自立會	7	7	4904	6055
基督會	8	10	911	1033
衛理公會	30	84	9708	21790
聖公會	27	55	13454	2486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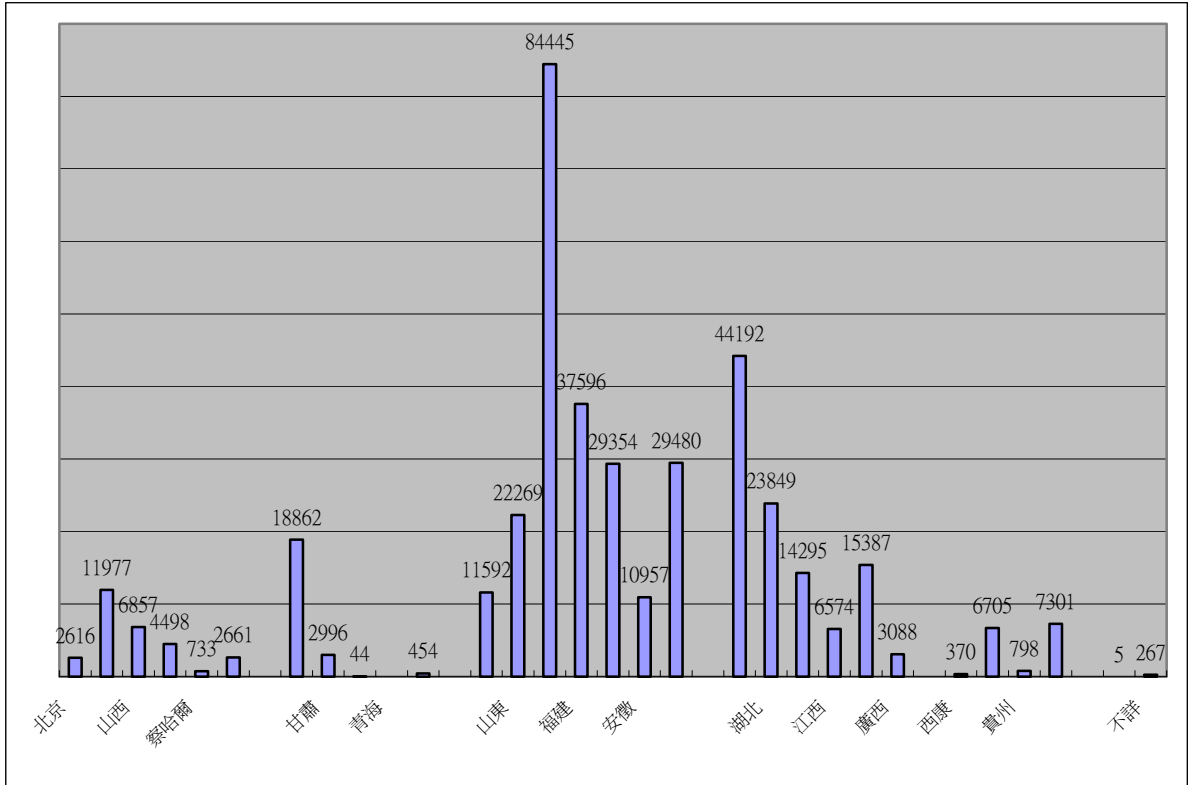
信義會	32	72	16728	42177
浸會	17	42	6129	8616
循道公會	17	62	5250	21500
循理會	3	3	353	1418
內地會	16	88	2982	11071
宣聖會	3	3	70	125
宣道會		12	3523	4478
宣教會			52	64
聖潔會			1074	1472
清潔會			83	83
公理會	12	20	880	892
公誼會			180	180
中華行道會			44	272
中華傳道會			82	117
佈道會			2048	2351
遵道會			4	4
安息日會		10	3316	7009
崇真會		20	2318	3020
神召會		8	2836	3498
天召會			57	57
長老會	6	6	2666	3416
來復會			182	182
復初會			6	6
中國福音會			67	211
禮賢會			37	37
主恩會			44	44
美以美會			6	6
以馬內利			273	274
伯特利			550	575
路德會			235	288
真神會			11	11
真理會			22	36
貴格會			93	252
友愛會			181	181
信愛會			1	1
靈恩會			363	430
協同會			1290	7212
協力公會			85	85
中國基督教會			1301	2886
中國耶教教會		31	522	534
耶穌教自立會			5060	21927

真耶穌教會			953	13106
中國播道會			155	155
基督肢體會			29	29
使徒信心會			1286	2157
五旬節會			30	30
旅行佈道團			44	44
靈工團	10	10	1993	1993
聖工團			624	624
救世軍			119	2164
基督徒公會			36	36
基督徒自理會			20	20
基督徒聚會處			34983	36168
宗派不詳	113	487	16914	55207
耶穌家庭	381	589	1747	3220
青年會	109	147	424	671
女青年會	197	243	319	328
神學	25	83	1239	1394
大學	43	47	1072	1128
中學	66	89	1170	1541
兒童教育	20	40	1009	1015
民眾教育		23	47	47
盲校			105	105
醫院	123	254	1598	1697
書刊	22	27	128	128
其他團體個人	69	241	1727	3417
集體簽名			893	
基督徒聚會所			625	647
聖教會				36
使徒信道會				64
通聖會				58
約老會				135
天主教			438	
總數	1527	3268	200195	400222

圖表三：革新宣言簽名人士背景 1953 年 9 月



圖表四：革新宣言簽名人土地域分佈 1953年9月



引用書目

- 〈上海市抗美援朝愛國運動情況〉，《內部參考》，第 44 號（1951 年 3 月 17 日）。
- 〈中央文教委員會邀華北區天主教人士茶會，交換天主教革新運動意見〉，《人民日報》，1951 年 1 月 21 日。
- 〈中共中央關於天主教、基督教問題的指示（1950 年 8 月 19 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 1 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
- 〈中共中央關於積極推進宗教革新運動的指示（1951 年 3 月 5 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 2 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
- 〈中南區二月份情況概要〉，《內部參考》，第 36 號（1951 年 3 月 3 日）。
- 〈中國基督教在新中國建設中努力的途徑〉，《天風》，總 233 至 234 號（1950 年 9 月 30 日）。
- 〈中國基督教抗美援朝三自革新運動委員會第一次會議記錄〉，《天風》，第 262 至 263 期（1951 年 5 月 8 日）。
- 〈中華基督教會全國總會站起來了〉，《中華基督教會全國總會公報》，第 23 卷 2 期（1951 年 2 月）。
- 〈天津基督教和天主教內部分化，上層分子對抗三自運動〉，《內部參考》，第 11 號（1951 年 1 月 22 日）。
- 〈天風信箱〉，《天風》，第 227 期（1950 年 8 月 19 日）。
- 〈文件發起人致全國同道書〉，《天風》，第 233 至 234 期（1950 年 9 月 30 日）。
- 〈全國基督教會議〉，《天風》，第 200 期（1950 年 2 月 11 日）。
- 〈全國基督教會議決停開〉，《天風》，第 225 期（1950 年 8 月 5 日）。
- 〈全國基督教會議延期召開〉，《天風》，第 210 期（1950 年 4 月 22 日）。
- 〈全國基督教會議延開〉，《天風》，第 209 期（1950 年 4 月 15 日）。
- 〈全國基督教會議的近訊〉，《天風》，第 214 期（1950 年 5 月 19 日）。
- 〈全國基督教會議的消息〉，《天風》，第 219 期（1950 年 6 月 24 日）。
- 〈全國基督教會議的籌備〉，《天風》，第 199 期（1950 年 2 月 4 日）。
- 〈再退一步希望〉，《恩友團契月刊》，第 2 卷 8 期（1950 年 8 月）。
- 〈再論基督教協商會議〉，《天風》，第 192 期（1949 年 12 月 10 日）。
- 〈艾年三牧師訪問太原教會〉，《天風》，第 215 期（1950 年 5 月 27 日）。
- 〈抗美援朝〉，《內部參考》，第 23 號（1951 年 2 月 14 日）。
- 〈協進會吳總幹事辭職訊〉，《天風》，第 205 期（1950 年 3 月 18 日）。
- 〈協進會執委會重要決議〉，《天風》，第 186 期（1949 年 10 月 29 日），頁 12。
- 〈協進會組成會務委員會〉，《天風》，第 224 期（1950 年 7 月 29 日）。
- 〈協進會新執委產生〉，《協進月刊》，第 9 卷 4 期（1950 年 12 月）。
- 〈武漢教會領袖熱烈擁護基督教愛國人士最近發表的宣言〉，《信義報》，第 4 卷 19-20 期（1950 年 10 月）。
- 〈政府尊重宗教信仰自由〉，《天風》，第 196 期（1950 年 1 月 14 日）。
- 〈革新宣言簽名已近九萬〉，《天風》，第 247 期（1951 年 1 月 20 日）。
- 〈個人消息〉，《同工》，新 3 卷 10 期（1949 年 12 月）。
- 〈個人消息〉，《同工》，新 3 卷 8 期（1949 年 10 月）。
- 〈展開教會歷史的新頁——基督徒領袖發表書面談話〉，《天風》，第 233 至 234 期（1950 年 9 月）。
- 〈基督教人士的愛國運動〉，《人民日報》，1950 年 9 月 23 日。
- 〈基督教訪問團北上行程已定〉，《天風》，第 209 期（1950 年 4 月 15 日）。
- 〈基督教訪問團訪問華北〉，《天風》，第 208 期（1950 年 4 月 8 日）。
- 〈基督教華北訪問團返滬〉，《天風》，第 217 期（1950 年 6 月 10 日）。
- 〈基督教會議的籌備近況〉，《天風》，第 205 期（1950 年 3 月 18 日）。
- 〈基督教團體組織訪問團〉，《天風》，第 188 期（1949 年 11 月 12 日）。
- 〈教會應改組全國機構實證耶穌福音〉，《協進月刊》，第 8 卷 3 期（1949 年 11 月）。
- 〈華東區訪問團團員介紹〉，《天風》，第 191 期（1949 年 12 月 3 日）。
- 〈華東訪問團已定期成行〉，《天風》，第 190 期（1949 年 11 月 26 日）。
- 〈鄂省通令遵（尊）重教會房產〉，《天風》，第 212 期（1950 年 5 月 4 日）。
- 〈對吳耀宗等的中國基督教會三自宣言的批語（1950 年 7 月 19 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 1 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78）。

- 〈對於天主教基督教問題應有的認識〉，《天風》，第 242 期（1950 年 12 月 2 日）。
- 〈廣元、重慶宗教革新運動迄無進展〉，《內部參考》，第 65 號（1951 年 4 月 14 日）。
- 〈廣州教會團體學校醫院反美愛國三自運動蓬勃展開〉，《天風》，第 252 期（1951 年 2 月 24 日）。
- 〈學習廣州同道的工作經驗〉，《天風》，第 252 期（1951 年 2 月 24 日）。
- 〈歷次籌委會常務會議重要決議〉，全國基督教會議籌備委員會編，《全國基督教會議籌備情況報告》，第 1 號（1950 年 6 月）。
- 〈歷次籌委會常務會議重要決議補充報告〉，全國基督教會議籌備委員會，《全國基督教會議籌備情況報告》，第 2 號（1950 年 7 月）。
- 〈關於中國基督教三自宣言簽名運動的批語（1950 年 9 月 8 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 1 卷。
- 〈關於基督教問題的四次談話（1950 年 5 月 2 日-20 日）〉，《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 1 冊。
- 〈關於廣播吳耀宗文章給吳喬木的信（1950 年 10 月 21 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 1 卷。
- 〈籌備全國會議機構是怎樣產生的？〉，全國基督教會議籌備委員會編，《全國基督教會議籌備情況報告》，第 1 號（1950 年 6 月）。
- 〈歡迎天主教人士的愛國運動〉，《人民日報》，1951 年 1 月 8 日。
- 《上海宗教志》編纂委員會編，《上海宗教志》（上海：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
- 「會議專號」，《信義報》，復刊第 5 卷 1 期（1951 年 4 月）。
- 中共中央文獻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1950 年 6 月 25 日，上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
- 中國天主教愛國會、中國天主教主教團編，《中國天主教獨立自主自辦教會教育教材》（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
- 王明道日記（原稿），1950 年。
- 巨贊，〈一年來工作的自白（續完）〉，《現代佛學》，第 1 卷 2 期（1950 年 10 月）。
- 本社，〈談全國基督教會議籌備會擴大會議〉，《恩友團契月刊》，第 2 卷 5 期（1950 年 5 月）。
- 田景福，〈有關宣言簽名的三個問題〉，《天風》，第 242 期（1950 年 12 月 2 日）。
- 田景福，〈我與三自愛國運動〉，氏著，《田景福三自文選》（西安：陝西省基督教兩會，1990）。
- 朱友漁，〈朱友漁自傳〉（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1972）。
- 江長川，〈教會革新與第十四屆年會〉，《協進》，第 9 卷第 3 期（1950 年 11 月）。
- 何慈洪記，〈人民政協基督徒代表的話——上海「歡迎人民政協基督徒代表」晚會追記之二〉，《天風》，第 192 期（1949 年 12 月 10 日）。
- 何慈洪筆記，〈基督教與新時代〉，《基督教叢刊》，第 24 期（1950 年 3 月）。
- 吳建國等編，《當代中國意識形態風雲錄》（北京：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
- 吳高梓，〈全國基督教協進會第十四屆年會〉，《協進月刊》，第 9 卷 3 期（1950 年 11 月）。
- 吳耀宗，〈人民民主專政下的基督教（續）〉，《天風》，第 177 期（1949 年 8 月 27 日）。
- 吳耀宗，〈人民民主專政下的基督教〉，《天風》，第 176 期（1949 年 8 月 20 日）。
- 吳耀宗，〈八個月來基督教三自革新運動的總結〉，《天風》，262 至 263 期（1951 年 5 月 8 日）。
- 吳耀宗，〈怎樣推進基督教革新運動〉，《天風》，第 237 期（1950 年 10 月 28 日）。原刊於《光明日報》，1950 年 10 月 20 日。
- 吳耀宗，〈展開基督教革新運動的旗幟〉，《天風》，第 233-234 期（1950 年 9 月 30 日）。
- 吳耀宗，〈基督教的改造〉，《天風》，第 173 期（1949 年 7 月 30 日）。
- 吳耀宗，〈基督教革新運動〉，《協進月刊》，第 9 卷 4 期（1950 年 12 月）。
- 吳耀宗，〈基督教革新運動的新階段〉，《人民日報》，1951 年 1 月 15 日。
- 吳耀宗，〈基督教訪問團華中訪問記〉，《天風》，第 204 期（1950 年 3 月 11 日）。
- 吳耀宗，〈控訴美帝國主義在青年會內利用改良主義侵略中國〉，《天風》，第 276 號（1951 年 8 月 11 日）。
- 吳耀宗，〈對於人民政協會議三大文件的擁護——人民政協會議宗教界民主人士首席代表吳耀宗發言〉，氏著，《黑暗與光明》（上海：青年協會，1949）。
- 李勇、張仲田編著，《統一戰線大事記——解放戰爭時期統一戰線卷》（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1988）。
- 李維漢，〈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新形勢與新任務（1950 年 3 月 21 日）〉，《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 1 冊。
- 李儲文記，〈吳耀宗先生在北京各教會聯合禮拜的傳達〉，《同工》，新 5 卷 5 期（1951 年 5 月 1 日）。

- 李儲文記，〈青年會的宗教基礎——吳耀宗同工講〉，《同工》，新 5 卷 1、2 期（1951 年 2 月）。
- 沙毅，〈我為甚麼在基督教宣言上簽名？〉，《信義報》，第 4 卷 21 期（1950 年 11 月）。
- 沈亞倫，〈「天國好像麵酵」〉，《天風》，第 210 期（1950 年 4 月 22 日）。
- 沈德溶，〈一位堅貞愛國的宗教界領袖——吳耀宗〉，中共上海市統戰部統戰工作史料徵集組編，《統戰工作史料選輯》，第 4 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 沈德溶，〈吳耀宗先生在上海〉，氏著，《在三自工作五十年》（上海：中國基督教全國兩會，2000）。
- 沈德溶，〈記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的誕生〉，氏著，《在三自工作五十年》。
- 沈德溶，〈願《天風》為建構「和諧社會」出力〉，《天風》，2005 年 3 月。
- 沈德溶，〈吳耀宗小傳〉（上海：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1989）。
- 汪維藩，〈丹楓一葉——懷念羅竹風同志〉，上海社會科學會聯合會編，《羅竹風紀念文集》（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7）。
- 赤耐主編，《當代中國的宗教工作》（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8），上冊。
- 邢福增，〈中國基要主義者的實踐與困境——陳崇桂的神學思想與時代〉（香港：建道神學院，2001）。
- 邢福增，〈反帝·愛國·屬靈人——倪柝聲與基督徒聚會處研究〉（香港：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2005）。
- 邢福增，〈三自愛國運動的起源與發展（1949-1957）〉，邢福增、梁家麟，《五十年代三自運動的研究》（香港：建道神學院，1996）。
- 周恩來，〈在中共中央統戰部舉行的茶話會上的講話〉（1951 年 1 月 20 日），中共中央統戰部研究室編，《歷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概況和文獻》（北京：檔案出版社，1988）。
- 周恩來，〈發揮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積極作用的幾個問題〉，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 1 冊。
- 周福慶，〈控訴美國侵略工具趙世光〉，《天風》，第 270 期（1951 年 6 月 30 日）。
- 林利民，〈遏制中國——朝鮮戰爭與中美關係〉（北京：時事出版社，2000）。
- 姚民權、羅偉虹，《中國基督教簡史》（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
- 孫彥理，〈我所認識的江長川會督〉，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上海市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上海文史資料》，第 81 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 浦化人，〈新中國基督教會的任要任務〉，《天風》，第 260 期（1951 年 4 月 21 日）。
- 張雪岩，〈我對基督教全國會議的意見〉，《天風》，第 200 期（1950 年 2 月 11 日）。
- 張賢勇，〈無為之用——關於梁家麟文中的趙紫宸先生及其他〉，《建道學刊》，第 11 期（1999 年 1 月）。
- 戚慶才，〈懷念愛國愛教的好榜樣吳耀宗先生〉，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編，《回憶吳耀宗先生》（上海：該會，1982）。
- 梁家麟，〈吳耀宗三論〉（香港：建道神學院，1996）。
- 梁藝府，〈記基督教訪問團艾年三牧師獨訪太原〉，《天風》，第 217 期（1950 年 6 月 10 日）。
- 畢詠琴，〈我對三自愛國運動的認識〉，《天風》，1983 年 2 期。
- 郭沫若，〈關於處理接受美國津貼的文化教育救濟機關及宗教團體的方針的報告（1950 年 12 月 29 日）〉，《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 1 冊。
- 陳一鳴、陳承融，〈沈體蘭先生傳略〉，吳漢民主編，《20 世紀上海文史資料文庫》，第 8 輯（上海：上海書店，1999），頁 128 至 134。
- 陳崇桂，〈重慶神學院與三反運動〉，《天風》，第 324 期（1952 年 7 月 26 日）。
- 陸定一，〈爭取團結廣大群眾，肅清帝國主義在中國的文化侵略的影響〉，《歷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概況和文獻》。
- 陸傳芳，〈在學習中認識三自，在工作中理解三自〉，上海市基督教兩會編，《上海基督教紀念三自愛國運動 50 週年神學思想建設研討會專輯》（上海：該會，2000）。
- 黑龍江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黑龍江省·宗教志》（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9）。
- 趙天恩，〈當代中國基督教發展史（1949-1997）〉（臺北：中國福音會，1997）。
- 劉良模，〈「警惕」是否「過火」？〉，《天風》，第 232 期（1950 年 9 月 23 日）。
- 劉良模，〈統一戰線與中國基督教〉，中共上海市統戰部統戰工作史料徵集組編，《統戰工作史料選輯》，第 4 輯。
- 劉良模，〈割斷與美帝國主義的關係，實行基督教三自革新〉，《同工》，新 5 卷 5 期（1951 年 5 月）。
- 劉良模，〈關於帝國主義與基督教〉，《天風》，第 230 期（1950 年 9 月 9 日）。

- 編者，〈中國基督教協商會議〉，《天風》，第 185 期（1949 年 10 月 22 日）。
- 蔡志澄，〈中華基督教會全國總會以具體行動響應自養號召〉，《天風》，第 249 至 250 期（1951 年 2 月 3 日）。
- 鄭建業，〈我敬愛吳耀宗先生〉，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編，《回憶吳耀宗先生》（上海：該會，1982）。
- 鄭新民，〈對全國基督教會議籌備工作的感想與意見〉，《天風》，第 210 期（1950 年 4 月 22 日）。
- 繆秋笙，〈美帝國主義怎樣通過基督教協進會破壞三自革新運動〉，《協進》，新 1 卷 1 號（1951 年 6 月）。
- 謝受靈，〈我為甚麼簽名？〉，《信義報》，第 4 卷 19-20 期（1950 年 10 月）。
- 羅竹風，〈緬懷吳耀宗先生，堅持「三自愛國」道路〉，《回憶吳耀宗先生》。
- Bush, Richard C. *Religion in Communist China*. Nashville: Abingdon Press, 1970.
- Wickeri, Philip L. *Seeking the Common Ground: Protestant Christianity, the Three-Self-Movement & China's United Front*. N. Y.: Orbis, 1988.
- Xu, Yihua. “‘Patriotic’ Protestants: The Making of an Official Church.” in *God and Caesar in China: Policy Implications of Church-State Tensions*. eds. Jason Kindopp & Carol Lee Hamrin.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4, pp.111-112.